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3月15日第7期 总第251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1期

地方文革专辑(7)

【编者按】

民间治史，大势所趋

【专稿】

周孜仁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到溃堤（1959年—1967年1月8日）

第二章 狂飙初起（1966年4月—1966年9月）

- 一、自作聪明的高治国和稀里糊涂的四月提纲
- 二、照葫芦画瓢：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云南分店”
- 三、工作组：难以重温的“反右”旧梦
- 四、以攻为守
- 五、“八二三风暴”
- 六、力不从心的反扑
- 七、“破四旧”：转移斗争方向的输诚之举
- 八、平庸的“三字兵”与“九一四风云”

【综述】

启之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河北、河南的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杜钧福 河北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河北部分》补遗

杜钧福 河南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河南部分》补遗

【文摘】

赵园 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

【读者来信】

1. 俞小平：打在棉花上 2. 蒋健：250期乌扎拉文中的误植

【本刊声明】

【编者按】


民间治史 大势所趋

中国治史，一向有朝野之分。朝廷治史叫官史、皇朝史。民间治史叫私史、野史。民间与朝廷在治史上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自由写作，后者是听命领导。所以，民间以“直书”见长，朝廷以“曲笔”取胜。直书产生实录，“令贼臣逆子惧”。曲笔产生诬书，“令忠臣义士羞”。（刘知几）

皇家不喜欢民间治史，对“秉笔直书”更是怕的要死，恨的要命。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怕人们利用诸子百家和春秋史乘“颂古非今”，他巡游宇内，到处刻石勒铭，一是宣传自己的功绩天下第一，二是告诫后世，他建立的制度“顺承勿革”。秦虽至二世而亡，但其严禁“非今”的文化原则，却被后世统治者所遵循。北魏重臣崔浩撰写国史，披露了鲜卑早年的丑事，引来了杀身灭族之祸。开皇十三年，隋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时至明清，文字成贾祸之源，私人治史更成大忌。明儒抄书以全躯，清人考古以避祸。除了明末三大家和章实斋、龚定庵外，整整有清一代，民间治史者绝迹。

毛泽东时代极大地发扬光大了嬴秦事业，只准官家治史，没有私人空间。只准歌功颂德，严禁实话实说。后毛时代改革开放，经济多元。思想摆脱依附，人格走向独立，社会出现空隙。官家虽严禁私人议论红朝，对文革研究和写作更是如临大敌，但民间著述不绝如缕，自印的家史、回忆、传记、口述势不可挡。文革史的两大难点和空白：地方史和单位史，正在被有志者攻克。数千年来，皇家垄断历史，独霸话语权的好日子不再。

本刊247期地方专辑（六）发表了周孜仁先生的《云南文革史稿》第一卷的第一章。本期发表的是这一卷的第二章。这部史稿是诞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第一部民间史乘，虽仅是初稿，但意义非凡。

征得赵园先生的同意，本期选载了她的《思想·材料·文体——治学杂谈之一》一文。赵先生原是现代文学研究者，后转入历史研究，其明清研究，独辟蹊径，超迈前贤。此文是她的治学心得，对民间治史者大有好处，值得再三细读。

【专稿】

云南文革史稿·卷一

阎红彦时代：从管涌¹到溃堤狂奔的仇恨与错位的篱笆

（1959年—1967年1月8日）

周孜仁

第二章 狂飙初起

六、自作聪明的高治国和稀里糊涂的四月提纲

云南清算“于梁反党集团”不到一年，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便从上海滩悄然刮起：1965年11月10日，经江青和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正式引爆了历时十年的大内乱“文化大革命”。

共产党执政17年，政治运动从未间断，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传》、整“高饶反党集团”、批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该落马的落了，没落马的，已获得足够的免疫力，练就一身“硬功夫”：只要亦步亦趋紧跟北京，准没错儿；如果想出出风头，甚至趁机再上个台阶，就干得比上峰号召的再“左”些，一般不会有差池。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虽说毛泽东新招迭出，让云南的“老革命”们也遇到了“新问题”，但只要照此办理：跟风，想必不会大错。

最先是北京批海瑞，云南也跟着批海瑞。1966年2月，云南学术界就事论事，接连举行了4次会议讨论《海瑞罢官》，参会者主流发言和北京充分保持一致，认定《海瑞罢官》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宣扬阶级调和论和封建道德继承论，歌颂和美化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配合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进攻，确乎代表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大毒草，必须批判。也有少数人不晓事，唱点反调，说《海瑞罢官》大体符合历史事实，有现实教育意义，不提。

¹ 水利学术语，指水坝坝身或坝基的土壤颗粒被渗流带走，对水坝形成一种渐进性的破坏。

2月16日，省委收到中央《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该文件乃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主持制作，云南同样没搞清楚毛泽东闷葫芦卖什么药，皆因来头不小，云南马上紧跟。17日，云南省委分管意识形态的文教书记兼宣传部长高治国，当即决定成立一个领导班子贯彻执行之。

高将“二月提纲”批转副部长张更生，要张提出班子组建方案。3月3日，宣传部正式成立由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负责人组成“九人小组”，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任组长，具体抓学术批判工作。5日，九人小组召开首次会议，高治国发表讲话称：“要坚决贯彻‘放’的方针”，“不要到处去抓小吴晗、小田汉”“还是我在云南大学批巴人¹的经验：批判巴人，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巴人。我们也要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通过批判吴晗，把政治水平提高一步，这就是目的”“不要以为不找一个，我们就是政治上不敏锐了”“好像不找一个，就怕人家说右倾，这类问题我们还是先把它当作认识问题”。²

高治国，山西五台人，出身书香门第，1937年加入中共。抗战期间任山西第5专区保安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团政委，后任晋冀鲁豫军区旅副政委、二野三兵团师政委。高身材矮小，壮而硕，为人谦和面善。1960年至1964年间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严于律己，谦恭下士，工作之余研读《资治通鉴》，还定期请老教授为之讲课，大有古仁者之风。云南大学当年学生至今犹记高校长俩小孩就读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附中，平日在校寄宿，周末还得背行李回家（因家中无多余卧具）。孩子去大观楼公园游玩，只能步行往返，每次只给一人一角零花钱，5分购门票，另外5分买一杯清茶³。更重要的是，高治国提出“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重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强调“全校51个教授、副教授是一批了不起的财富”。高治国位显而不骄、工作多有独特见解，故而于1964年提为省委宣传部长，一路顺风顺水。这一回，所谓“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自然成了他的得意之笔。

3月29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提出要听取“云南学术讨论”情况，

¹ 著名作家王任叔的笔名，60年代初期，其文艺观点曾受到批判。

² 《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第33、34页。云南省委党史办编写，2005年。

³ 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云映滇池》（未刊稿）。

指明参加汇报的人由宣传部指定。高治国给他请来一堆文化教育人士：云南大学副校长、文学家李广田、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侯方岳、组织部副部长崔子明，省文化局局长陆万美，等等。周兴系“无产阶级革命家”级别的老革命，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瑞金时打过A B团，延安整风跟康生搞过“抢救运动”。这一回，他莫名其妙对文革十分在意，足见其对北京跟随之紧。听完汇报，周兴很不满意——因为他自己就什么都没搞明白——于是按惯例作一通指示，说云南省应该列于还没有动的13个省之一，要加强领导。他提出：一、党委要亲自把学术批判抓起来；二、这是一场兴无灭资的斗争；三、我们对文化战线的底子还不清楚，要进一步摸清底子，云云。作为“老保卫”，周兴对领袖、对上司绝对忠诚，对政治话题绝对敏感，只是性格使然，常多疑而不善断，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周兴的固执和糊涂砸文革中表现得多么充分。

如此，根据北京的《二月提纲》、高治国3月5日讲话、周兴的“3.29指示”，还有前一段云南学术批判中的情况，宣传部于4月2日整出一个《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经补充修改后送省委工作会议讨论，7日，作为云南开展学术批判的汇报材料上报西南局。这个后来惨遭恶批的材料被称为《四月提纲》。

“提纲”共分两大块：《情况》和《意见》。《情况》部分叙述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在云南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的震动，及对这场论战的疑虑和惶恐。有对姚文持不同意见的，认为“绝对化、片面化”，“用一条阶级界限，就把历史人物一笔抹去”“把退田与单干风联系起来，平冤狱与翻案风联系起来，加罪吴晗，不够与人为善”“不顾客观事实，歪曲、偏激，今后谁还敢评论历史人物？谁还敢写历史剧？”；也有人担心：“这次是不是1957年？”“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等等；《意见》部分则提出：一、要分步骤把中央指示精神贯彻下去；二、要坚决贯彻中央“放”的方针。当前云南学术界的问题，大量的认识问题，可以采取“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的方法，达到在学术界划清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个主义界限的目的，而不要硬找我们这里的“小吴晗”、“小田汉”，使多数人能解除顾虑，在批判吴晗等人的过程中，自觉地批判自己的错误观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使大多数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观点上与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划清界限，逐步形成无产阶级学术队伍。如果在讨论过程中，发现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言行，是什么问题就当作什么问题对待；三、引导工农兵群众参加这场斗争，推动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和科学文化；四、各个有关的学会、党校、大学、文联等单位，都要把学术讨论工作认真抓好；五、在大学文史系和昆明市的中等学校中搞若干试点，摸索深入讨论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如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

《四月提纲》最得意的“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不要硬找‘小吴晗’‘小田汉’”等，均出于高部长的得意之笔，写得有板有眼——这个山西才子压根儿没有想到，很快，自己就成了云南的“小吴晗”。

4月4日，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指示发出通知，决定成立由高治国、刘披云（省委常委、副省长）、岳肖峡（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崔子明、王甸（省委副秘书长）、张更生、任大卫（宣传部副部长）、李孟北（云南日报主编）、黎韦（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组成的“中共云南省委文化革命九人小组”，高治国任组长。九人小组尚未满月，5月7日省委常委又决定将其撤销，改立“云南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5人，仍由高治国任组长，保留王甸、任大卫，另加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许志奋和团省委书记张世祯。5人小组成立不足20天，5月19日，赴西南局开会的阎红彦又从成都打回电话，指令：1、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增加人，至少增到20人；2、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还是改成文化革命小组，不要“领导”二字。事情变化之快，让人确疑闫红彦有点乱了方寸。5月30日云南省委正式上报西南局的云南省委文革小组成员名单再次教人疑惑：人数调整为7：在5人班子基础上加马文东（省委秘书长）和戈力（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高治国依旧任组长，马文东任副组长。像小孩儿“过家家”。5月31日，西南局批复同意。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云南这帮封疆大员果然外行。4月7日才上报了《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所谓“四月提纲”）》，很快便得知了《二月提纲》已惹得毛泽东龙颜大怒——3月底，毛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诸人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云南省委这一跳吓得可不轻，4月18日即刻召开常委扩大会，认定“四月提纲”有严重错误，立即收回。“四

月提纲”的操刀者、“九人小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均担任组长的高治国，头上悬剑这回注定要落下了。

5月16日，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声色俱厉对“二月提纲”大张挞伐，号召“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通知》最后点题：“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具体落实到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落马。

云南省委收到“五一六通知”是5月24日。这个纲领性文件续农村“四清”运动“23条”之余烈，再次明确：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回，傻瓜也该懂了，不交出个把“大家伙”是过不了关的。云南省委旋于6月2日至10日召开会议对运动进行部署。6月4日，正式将高治国抛出来，罪名首先是高主持的“四月提纲”有“原则性错误”；第二，高“擅自成立‘九人小组’”，等等，这已经够了，虽然谁都明白这几个小组是怎么变来变去的，但强令高治国和省委宣传部进行检查的指令必须执行。

6月29日，省委常委会集中火力批高。当晚，即免除高治国省文革小组长、西南文革小组成员职务并由孙雨亭（省委书记处书记）任省委文革小组组长，请示报告电呈西南局，次日西南局批示同意；再次日，西南局批复免去高治国西南局文革小组成员职务；再次日，省委常委会讨论高治国的错误性质，先将人判了，再寻找罪证；接下来，7月4日至6日，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并吸收部委和大口部分负责人参加，批高运动持续升温。9日，省委将揭批情况向中央并西南局作了报告。该《报告》翻出老账，说高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期间，“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扬“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提倡教授治校，宣扬业务第一，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右派喊冤叫屈”“为牛鬼蛇神翻案”……甚至两月前写进省委文件的“不硬找小吴晗、小田汉”“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亦成了“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极力抗拒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铁证；至于受命于省委组建的九人小组，则成为“背着省委”“拼凑了一个右派势力集团，把领导权交给他们”。所谓“四月提纲”，更成了“彻头彻尾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纲领”，云云。《报告》最后定性，称：“省委常委7月6日会议一致认定高治国是一个钻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决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彻底肃清他的影响。省委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他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7月20日，西南局复电报中央“并告省委，我们同意云南省委7月9日报中共中央并西南局的请示中提出的成立专案小组对高治国的罪行彻底进行清查的意见。……撤销高治国省委书记处书记及一切职务的问题，可待批判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再行宣布。当否，请批示。”

这一回，中央未作批示。自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一直在杭州、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巡游，1966年6月18日，秘隐于韶山滴水洞，精心谋划他的文革大计。在南方呆了将近9个月，7月18日方才返回北京。16日，途径白云黄鹤之乡，他还专门高调地畅游一把长江，向国人宣示他身体非常棒，对即将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他信心十足。毛马上要向他真正的潜在敌人刘少奇发起进攻，他需要拿出来“烧一烧”的“黑帮”会很多，北京没有人顾得过云南边地一个小小的高治国。

北京批与不批已不重要，云南官场的同僚们既已达成“诛高”共谋，至少可以暂时无忧了。古人惧怕河神降灾，有将童男童女作牺牲投河祭献之礼；1960年代的中国文革，各地官员害怕被捧上神坛的领袖震怒，亦纷纷抛出牺牲品。云南的高治国不幸成了倒霉蛋。

7月9日，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省委宣传部。工作组宣布，全体干部停止工作，投入运动，抓高治国的“黑班子”。根据部署，运动矛头要对准参与研究、起草、审阅“四月提纲”的高治国、张更生和吴玉才，即所谓“高、张、吴反党集团”。“高治国的亲信”亦很快被揪出了，于大会小会接受批判。高、张、吴等人被隔离审查，家属亦遭株连、迫害¹。后来省级机关造反，宣传部成了最先喷发的火山口，正是对此的反弹。

高治国落马是7月下旬，此时派往高校的工作组已经进驻。大学生们无知的愤怒绝对可用。一经工作组煽动，批高运动很快掀起狂潮。据官方统计，仅

¹ 参看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第33页

7月1日前两天时间，云南大学校园就贴出批高大字报732篇2792张，7月8日，大字报竟多达2220篇11811张。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也先后贴出了批高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形象进度果然喜人。¹

红极一时的高部长留下空缺，正式由孙雨亭填补。孙雨亭，山西夏县人，1927年加入中共，1955年来滇，先后任省边疆工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孙不苟言笑，风度儒雅，一望而知乃足智多谋、精明干练的“小诸葛”。事实上，对于应付文革千变万化的局面，他确实替闫红彦出了许多应对之招，正如当初儒雅的才子省长于一川为闫红彦擦屁股一样，因此，后来的云南文革故事里，便有了“笑面虎”“阎、孙黑邦”一说。

七、照葫芦画瓢：子虚乌有的三家村云南分店

1966年5月，云南省委还在应付《四月提纲》惹出的麻烦，北京继续频出新招，云南省委不得不疲于应接。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实由江青主持撰写）、同日，《光明日报》联袂发表署名“何明”（作者实为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进一步批判“三家村”。这次直接点名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谜底至此揭开：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与批《二月提纲》形成组合拳，目的是彻底打垮彭真控制的北京市委。被称为“政变经”的林彪“518讲话”，更是危言耸听：“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论语》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将此语换几个字来表述集权体制下的政治生态非常准确：“君王之德风，官员之德草”。在伟大领袖掀起的疾风狂飚之下，所有官员都是随风飘动的草。《云南日报》抓紧转载上述两文，接着按云南省委的调子煽动群众起哄。

为了查询史料，亦为寻找重回历史现场的感觉，笔者逐次查阅了1966年5月开始的《云南日报》。那段岁月是笔者年轻时代亲自经历的，但几十年后重新检阅，每一页报纸的版式、排列、标题及内容，仍让人骇然心悸，神经稍

¹ 同上

有脆弱者，想必会吓出一身冷汗。日报每天几乎都是特大号黑体字的通栏标题：

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

彻底粉碎吴晗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

工农兵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

捣毁三家村，彻底闹革命……

正文标题火药味更是威猛：《把邓拓一伙牛鬼蛇神挖出来，把邓拓黑帮的毒草铲除干净》（5月13日）《昆明部队广大指战员奋起向邓拓一伙猛烈开火，批判《前线》和《北京日报》充当邓拓庇护所的勾当》（11日）《我省广大群众义愤填膺痛斥邓拓黑帮》（19日）《我们伟大的党是骂不倒的》《吴晗为什么骂起皇帝来了》《一定要打退吴晗的进攻》（5日）《昆明许多厂矿职工连日纷纷集会痛斥邓拓黑帮罪行》……

按惯例，英模在这类口诛笔伐中是不能缺席的。5月20日头版，刊登了中甸县新联乡藏族民兵指导员七林旺丹的署名文章，题目是：《捍卫我们伟大的党和敬爱的毛主席，把一切牛鬼蛇神踏倒在脚下》。七林旺丹在1959年的藏区平叛中英雄独胆，闻名遐迩，文革中被圈定位“九大”代表，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因其名笔划最少，在“按姓氏笔划排序”的名单《公报》中，他总是名列榜首——接着进入云南省委常委班子；后来任副书记；再后来“四人帮”垮台，被清理出局，黯然离世。5月22日，云报再隆推出本土著名无手劳模徐学惠文章并配发手迹，声讨邓拓“一伙反党分子”，称：

我是党的女儿，绝不容许你们来攻击我最最敬爱的母亲——中国共产党。我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决心在这场关乎母亲的安危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和广大工农兵一道，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把你们这伙披着羊皮的狼的进攻彻底打退。

徐学惠原系边疆县陇川农场银行财务人员，1959年为保护公家钱柜，18岁的她1人独对6名持刀歹徒，被群匪砍掉双手而全国成名。1960年，中苏尚未翻脸，苏联赤塔社会福利局局长斯达烈诺娃女士热情邀请她前去做客，收她为自己的“中国女儿”，为女英雄安装了美容手和各种功能假手，羡慕无数

中国青少年。文革伊始，为表反帝反修之决心，徐学惠断然将这些“修正主义”假肢统统扔了，接下来，没有双手的女英雄继续用行动证明自己的誓言。她参加了一派群众组织造反，后来还被推荐为省革委副主任。文革破产后，她和同派造反领袖一道被批判，被“最最敬爱的母亲”隔离审查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皆因没有双手，得以幸免囹圄之灾。¹

在报上还能查到的名人还有杨李刚，昆明西山黑荠母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太太的批判文章题目是《邓拓要我们党下台是妄想》，她后来果然也为保卫毛主席而参加造反，还当了省革委常委。四人帮垮台，幸好她已年迈，没关进局子，只是挨了不少批斗，早早离开了纷繁的世界。

和批《二月提纲》一样，只是跟风，拿北京的黑帮说事是过不了关的。批《二月提纲》，云南省委找了一只替罪羊：高治国和经省委正式认可的《四月提纲》。那么这一次，北京既有“三家村”，云南难道无分店？说不过去嘛。

还好，1962年北京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受读者追捧之时，《云南日报》恰恰也在副刊《文化生活》上开辟了一杂文专栏。主编李孟北以“史常真”笔名在专栏发表了23篇杂文，又和原副总编、省人委办公厅副主任夏雨、副总编辑周钟德一起，用“李钟鸿”笔名发表了《立春有感》等杂文。专栏作者李、夏、周，人数正好为3；其次，1948年，中共接管北平，曾办了一张机关报《北平解放报》，李孟北与邓拓皆供职于此，同事兼上下级。1949年8月，全国解放在即，《北平解放报》根据市委决定解散，所有采编人员怀揣毛泽东手书各省日报报头，奔赴南方新区办报。²李孟北参加解放军二野西南服务团南下云南，临行时邓拓曾抱病相送，足见关系之铁。有此二端，坐实“‘三家村’云南分店”罪名足矣。

更洗不清的是，1962年春邓拓翩然来滇，阔别10余年的李孟北趋前拜会，畅谈之余，邓拓答应为《云南日报》副刊写诗，邓赠诗共3首，其中2首刊登在1962年2月12日《云南日报》《文化生活》副刊，诗云：“海枯石烂情无尽，地久天长恨不泯”“兴邦历代多谋略，溯源探源便可知”，这自然被批为“反动句子”。还有，1962年10月，《燕山夜话》第五集出版，邓拓在《奉告读者》

¹梁苹《女英雄的风雨人生》，见2004年11月16日《中国妇女报》

²刘观祥《揣着毛主席题字到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老同志讲历史将传统丛书》第一卷《边疆晓歌》第165页

一文中又对《滇云漫谭》赞赏有加，说：“《云南日报》在第三版右上方开辟了这样的专栏，名为《滇云漫谭》。我衷心祝愿这些报纸的专栏杂文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改进内容，更好地为读者服务。”自此，云南本土黑帮“‘三家村’在云南的分店”铁板钉钉了。从6月6日始，《云南日报》的通栏标题用特号黑体字大喊大叫发起攻击：

全省广大工农兵来信怒斥《滇云漫谭》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在云南的分店，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清算，彻底捣毁

先刊登“驻军某部”五好战士、劳模、贫（农）协委员等多人声讨文章：《这是为什么？》《把放毒者揪出来》《从反党分子手里夺回阵地》……次日，《云南日报》用整整两个全版公布罪行：全文共14600多字，提供给不明真相、不跟风骂人不足以表现“革命觉悟”的百姓批判。罪状计四大块：一、反对毛泽东思想；二、恶毒攻击伟大的党，攻击三面红旗；三、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思想改造，提倡埋头读书，提倡科学至上，在思想领域中推行“和平演变”。按语如此定义：

《滇云漫谭》的文章贯串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攻击的锋芒，指向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三面红旗，一句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正是“三家村”反革命集团向党发动进攻最疯狂之际，政治上配合得十分紧密。甚至连文章的格式、版面的安排，都和《燕山夜话》一模一样，这一切，当然不是巧合。《滇云漫谭》对党攻击的手法，也和《燕山夜话》一脉相承，都以讲历史故事、道德修养、山川景色、学问知识作为幌子，用隐晦的语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有时也夹杂几句马列主义的词句，装饰自己文章的门面，进行蒙混欺骗。但是仔细一看，特别是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他的反动本质，他的那些黑话都是有所指的，针对性很强。

下面各段皆有按语，一派杀气腾腾。仔细对照，其实全是按政治需要的牵强附会和无限上纲。比如，李孟北有一则文稿叫《立竿见影》，发表于1962年9月6日，专说读书学习方法，作者提出：“知识这个东西和商品的标价不一

样，一个店员今天记住标价，明天就用得上。看一本书，懂得一点知识，不一定明天用得上，尤其是做文字工作的同志，对待学习千万不能这样‘近视’。”作者以挑水抗旱和修水库作对比，提出“世界上的事，似乎有两类，一种是收效快的，但是起的作用小，一种是见效虽较慢些，但起的作用却大，影响也深远。”当时，恰有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林彪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李孟北的文章自然就大逆不道了，编者按语道：“李孟北咒骂林彪同志这一重要指示是‘近视’‘没有入门’‘想入非非’‘只是挑水抗旱’，‘难于使用’并视之为‘通病’……看他猖狂到何等程度！”

又比如，李孟北发表于1962年10月22日文章《欢迎平时严格》，文章由齐桓侯“讳疾忌医”的寓言故事说起，要人们对问题“预知微”“早从事”，这样则“疾可已，身可活也”。非常正常的一篇文章，到了批判者手里，罪名是：“这篇文章表面写的是个人修养问题，但又明指要人们对‘讳疾忌医’”“细想下去，其意义远不止这一点”，这明明是指桑骂槐！是辱骂我们党“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辱骂我们党“欠”了“债”，而且咬牙切齿地威胁说“债台高筑”，就“要破产”。“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再攻击党的总路线。苏联修正主义集团，说我们人民公社‘失败了’。《三家村札记》骂我们党患了‘不治之症’。李孟北的这篇文章，和他骂我们犯了‘路线错误’‘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是先后呼应的。意思是说，要我们尽早承认‘病入膏肓’，听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杂家’们的‘医道’。这岂不是要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吗？”

这些蛮不讲理、以势压人的按语，在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语境下并不新鲜，全国皆然。和不讲道理的人是没法讲道理的，尤其不讲道理的人手握生杀大权。以至于同一个省级党委的历史研究部门，30年后表述这件事也有点儿哭笑不得：“这些杂文紧密联系当时云南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工作实际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全省的中心工作，引用历史文献和历史掌故，富有思想性、哲理性和知识性，说理透彻，文笔优美，针对性强，很受读者喜爱，根本没有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¹，其实，若干篇什，如扁鹊见齐桓

¹ 参看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实》第25页

公，说讳疾忌医的问题，应该似有所指，对当时大跃进的问题婉转地提出一些意见，有什么不可呢？文章的体裁、风格、写作方法，都是摹仿《燕山夜话》的。这又有什么错呢？”¹

从6月6日至7月18日的43天里，《云南日报》辟出44个版面，刊登了180多篇文章、评论、消息和来信，共41万多字。开始，批判文章牵强附会，提高调门，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要“愤怒声讨”“猛烈开火”“共诛之，共讨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谁反对就叫他粉身碎骨”到后来，愤怒不断升级，完全骂街了，署名“昆明军区五好标兵陈X”的文章如此骂到：《李孟北的灵魂比尿罐臭百万倍》，西双版纳勐海县某“哈尼族妇女代表”干脆诅咒李孟北“像疯狗咬太阳”……云南人本厚道老实，尤其边疆少数民族，用他们的名义参与如此下作的政治操作，实在有失基本道德水准，也为日后的文革语言暴力提供了样板。

与公开点名批判同时进行的，是一连串组织措施，5月16日，省委工作组正式进驻《云南日报》社，组成“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了报社编委会并领导运动。26日，省委常委会正式认定《滇云漫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29日，省委向西南局报批李孟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公开点名批判。报告除指认李孟北在《滇云漫谭》专栏发表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文章，还与邓拓反党集团“关系很不正常，组织上也是听其指挥的”，“还有其他反党活动，历史不清”。30日，西南局批复同意——这就有了6月6日“双顺”之日，《云南日报》开始对李孟北“三家村”公开、全面、火力威猛的大批判。6月21日，中央正式电复西南局并告云南省委，同意撤销李孟北的职务。6月30日，《云南日报》公布《李孟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第二批材料。7月3日，根据省委决定，《云南日报》对夏雨、周钟德亦公开点名，并从批判文章转入对个人进行批判，云南日报社、省人委办公厅、云南省军区、新华社云南分社、《人民日报》云南记者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云南摄影站、《光明日报》云南记者站等新闻单位，联合举行大会对“云南分店”大肆揭露、批判之。地、州亦召开同样主题的批判大会。李、夏、周被撤职，关进“牛棚”。与李、夏、周三人有公私关系者（含报社通讯员、积极

¹ 同上注

分子等)，一律挂上“黑线”，成为“云南分店”的“黑须须根”。

毛泽东素喜以某文化典故入题而启式，而做政治大文。如果说，北京拿《三家村札记》开刀，目的是进剿彭真治下的北京市委，继而向“中央修正主义头子”发起进攻。边地循吏阎红彦问斩《滇云漫谈》，则纯系政治行为艺术。他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除了用“左”的调门向领袖输诚，最后结果正是自掘坟墓。文革初，云南省委利用政治公权力杀戮祭旗者制造的政治恐怖、行动暴力和语言暴力很快就演化成了红卫兵、造反派更加野蛮的政治恐怖、行动暴力和语言暴力，并且全部用来对付首开先河的“闫红彦之流”自己。

八、工作组：难以重温的“反右”旧梦

运动进展到此，云南省委主持文革的章法虽方寸慌乱，但大权在握，斗争矛头所指，云南日报也好、省级机关也好、高治国也好……还是所向披靡。直到196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批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运动进入学校，事情变得更麻烦了。

文革前17年，在与界隔绝、封闭信息环境长成的一代大学生，经过共产党不间断的洗脑灌输，头脑已经变得非常简单：一，当“党的驯服工具”；二、牢记阶级仇恨，“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三、“胸怀世界，放眼全球”，拯救正在堕落的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此外，1957年反右留下的精神恐惧，再加上学校严密的官办社团组织（共青团、学生会等）有效控制——学生这个社会上最敏感、最激进、最不安定的成分完全可以让云南省委大人物们放心无虞。

问题在于，随着文革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疯狂升温，所谓做“党的驯服工具”，已经变作“作毛泽东个人的虔诚信徒”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冲锋队员，而不再是简单的、各级基层共产党组织的“驯服工具”。这样，人们很快发现，一旦毛宣布哪一个层级（无论多高层级）党组织稍有叛逆，立即就会成为学生们无情攻击的对象——事情有点像马丁·路德提倡的宗教改革，每一个教徒都毋需接受基层教会层层束缚，只有凭借虔诚便可直接领受上帝旨喻——对基层共产党组织、包括云南省委，风险大大增加了，极而言之，只要

毛泽东一句话，所有的当权者便可顷刻瓦解。

1966年夏天，中国官僚还陶醉于1957年反右“阳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巨大胜利之中，这样，毛泽东的文革新招注定被他们误读——这一次，毛泽东想引出洞的，正是惯于整人的共产党官僚自己。聂元梓大字报一经发表，各地便纷纷向学校派出工作组灭火。云南省委的高校工作组是6月5日派出的，队员64人，由马文东、岳肖峡、赵守义、张克和张世祯五人带队，分别进驻云南大学、昆明医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和昆明农林学院。高校片总负责为孙雨亭。云南大学是云南历史最为悠久（成立于1922年）、名气最大的边地高校（校长先后为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无产阶级革命家周保中、以及后来的高治国）的大学。作为孙雨亭的“点”，派出重量级的人物马文东挂帅，由14人组成豪华阵容，足见其何等重视。

马文东，河北安平县人，1933年参加中共，1954年底始，历任云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文教部部长、副秘书长、秘书长。马眼窝深陷，目光炯炯，一看而知是乃精明干练之辈。多年秘书长历练，他说话逻辑缜密、条理分明、详略有度，一经记录，皆成文章，下属对此深感折服。由孙、马诸人亲自坐镇蹲点，以点带面，稳扎稳打，很快让云南高校工作组形成一套自成特色、行之有效的规范打法。这些打法是：

一、对运动打击对象和整肃范围划定框框，设置底线。6月11日，马文东在云大“声讨李孟北大会”上明确指出：“我要严肃、负责地回答一个问题，以阎红彦同志为首的云南省委是正确的，不能怀疑。李孟北的问题是省委揭发的。”又称，云大党委个别成员坏了，不等于党委坏了，希望少数有怀疑的人及早清醒过来。”7月2日，在全校五年级学生和其他成员会上，马文东再次警告：“省委是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是不容怀疑的。”“有人问高治国的根子在哪里，这样追是要上当的。有少数人企图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如果有少数人想鼓动闹事，要顶住。要相信党的领导，相信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领导。我们在搞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也在搞。不要和工作组闹对立。大家要和工作组合作。”¹

后来成为云南文革造反主力的昆明工学院，工作组亦根据省委统一部署，

¹ 刘兴育《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云南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印，2007年版

明确宣布“八不准”和两大措施，“八不准”是：1，内外有别，大字报不准上街。2、开会只准在校园内开。3，不准搞大规模声讨会。4，不准上街示威游行。5，不准串联。6，不准包围黑邦住宅。7，防止坏人破坏。8，注意保密。两大措施是：运动的一切权利归工作组，学校党委不参加领导；组建以工作组为中心的“校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各系成立“系文革领导小组”，两级机构的领导成员全部由工作组指定¹。云南学生本多老实规矩，“八不准”“两措施”出台，校园气氛顿时紧张了许多，系与系之间、班与班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不敢再行往来。大字报只能贴在指定区域。大字报内容书写前得事先报告。刚热闹一阵的热烈景象很快不再，恰如7月18日毛泽东回北京后“感到很难过”的光景：“冷冷清清”²。

二、制造高压气氛和恐惧感。通行做法就是用反右派故事对师生进行恫吓。云大工作组为让“杀鸡儆猴”效果更为震撼，直接动用专政机器抓人。工作组进校5天后的6月9日，即让省公安厅来校高调抓走俩学生。被抓之一乃化学系学生鲁坚，另一位为中文系黄某。作为对照，工作组同日偏向师生积极分子赠发《毛主席语录》2000余册。其时“小红书”之宝贵稀罕堪比基督徒之“圣经”。大棒与胡萝卜齐挥舞，足够让师生喜惧杂陈，心绪非非。

抓捕鲁同学罪名很简单：他一老乡在昆明工作，该老乡据说是个“反革命分子”，而鲁偏偏与其多有过从；黄同学被捕的理由更荒唐——黄的同班同学杜德威有如下文字回忆：黄性格开朗，一贯爱说笑，尤善吹笛拉琴。9日上午，黄正在宿舍吹笛，团支书王某手翻报纸低头回屋，黄想开个玩笑，遂将横笛作“枪”，大喊一声“缴枪不杀”，随即前刺：没承想笛子将王手中报纸戳了一个窟窿。那年月报纸天天都印毛泽东宝像，也活该黄生倒霉，这一“枪”正好洞穿了领袖“光辉形象”，性质很严重了。王书记和同室杨某当即表明严正立场，黄吓得连连检讨——事情到此该结了吧？没有。此事已用最快速度报至云南最高当局：共产党省委，下午4时，公安厅警车便呼啸而来，以“现行反革命”之罪将黄某正式逮捕。抓离校园，早吓得面如土灰的黄同学还被押进中文系党总支紧急召集的大会抓紧批判一通。知情人杨某情绪激动地揭发了黄同学仇恨

¹ 刘光华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未刊稿）。刘系昆明工学院采冶系学生，昆工第一个基层革委会主任，曾任东川市委宣传部科长。

²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第9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出版。

伟大领袖的滔天罪行，称用笛子行刺时对伟大领袖如何之“咬牙切齿”“刻骨仇恨”，接着还有临时安排的积极分子揭发批判，还有未经安排而争先恐后者亦纷纷发言以向毛泽东表忠心者——如同班蔡君，已暗中被内定“右倾”，为求自保，也对黄进行慷慨激昂的批判——待到三个月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查抄“黑材料”，蔡君才在同班另一位“左派”当天日记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姓蔡的反革命早迟也要抓起来才解恨呢”。同宿舍的周某也踊跃发言，言之凿凿，揭发某次黄曾向他打听从其家乡思茅到边境路有多远？要经过哪些地方？等，现在他才明白，原来黄早就想越境投敌！……

杜德威这样回忆当时的心情：我“暗暗提醒自己，今后与周君相处可要格外小心，以免到时又让他抓住什么小辫子。”批判会的发言者全都落井下石，把黄君平时说笑话讲的只言片语全都无限上纲，扣以一顶顶可怕的政治帽子……积极分子愤怒呼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谁胆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¹

杜德威用“杀气腾腾，阴风惨惨”来记录整个批判会场的气氛：

打从进入会场开始，我的心就狂跳不已，一边跟着大家高呼口号，一边在头脑中飞快地回忆着这些天来我与黄君的交往。倒不是在想是否有什么可以揭发的，而是在想我自己这些天可曾说错过什么，做错过什么。最糟糕的是当天中午饭后我还和他一道有说有讲、搂肩搭背地从食堂走向宿舍，这段路途有几百米远，难免已被别人看到，不知别人会怎么看我呢？

想到这里，两腿发软，喉咙发干，身子便不由微微颤抖起来，额头和手心也不知不觉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批斗会结束，黄君在一阵阵让人心惊肉跳的口号声中被带出会场时，我偷偷看了黄君一眼，只见黄君的眼睛充满了绝望的忧郁。

工作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捕黄、鲁，对不谙世事的大学生不啻一雷霆下马威。为让恐怖持续，工作组还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告诫，说随着文革的深入，阶级斗争必将日趋尖锐复杂，隐蔽很深的阶级敌人很可能兴风作浪、狗急

¹ 参见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雨映滇池》（未刊稿），文革时杜为云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毕业后在大理党校任教。

跳墙。因而，这又需要把“左派学生”组织起来值勤巡夜。既然属于“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值勤巡逻是不能让一般同学知道的，只能秘密进行，“外松内紧”，由校保卫科分区划片，设置口令，交付各系实施之。杜德威有幸被列入了中文系的“左派”巡逻队，巡夜路线是“从本系男生宿舍出发，绕校图书馆大楼，从女生宿舍楼边走过，拐入一院教工宿舍，穿过走廊进入校卫生科小院，然后又往回转。每班值勤时间为2小时，一般这么来回走上两趟，就该叫醒下一班的人来轮班了。”

保卫科要求巡逻者手持木棍，满带“敌情观念”梭巡，于是草木皆兵。“每当巡逻到教工宿舍时，我们总是格外认真。哪一扇窗子夜间还亮着灯，或者夜间开过灯，我们都要记录下来。有的同学甚至还要蹑足到窗下去窃听一会儿，听听里边有何动静：是否在搞收发报，是否在销毁罪证，还是要转移“变天账”……有一次，某同学靠上窗前偷听几分钟后悄悄告诉说，他听到里面有擦火柴的声音，想必有人在销毁什么罪证，过一会儿又听得女人声音道：半夜三更的抽什么烟哟，把屋子搞得怪闷的，以后再无声响，灯亦灭了。第二天杜同学一行极端认真将这一“敌情”报告保卫科，认为该教工一定思想紧张，很可能有问题，否则半夜三更为何睡不着、要起来吸烟？保卫科按方位查出这个教工姓名，通报其供职单位安排人密切观注其动态。还有某日，某屋电灯夜半亮了，巡夜同学吓得急摸靠前，过后方知，那家的小孩半夜拉肚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头天晚上被人窃听了的教职工，第二天还会跑到校保卫科反映情况说，头天夜里，他们似乎听到窗外有动静，不知是怎么回事，请保卫科加以注意。保卫科只好解释说，那是我们保卫科巡逻的同志巡逻中发出的声响……同时表扬他们的革命警惕性高，希望他们以后遇事多与保卫科联系。事后保卫科又要求我们，以后巡逻中尽可能不要弄出响声。而打这以后，在教职工宿舍院，半夜里几乎再也看不到亮灯的窗子了。”¹

工作组打法之三，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名，挑动学生斗老师，挑动群众互相攻讦、制造混乱，以使人人自危。

6月2日至10日，云南省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贯彻西南局重庆会议精神，安排文革部署，阎红彦在会议总结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是集中

¹ 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雨映滇池》

力量打击牛鬼蛇神，打击反革命，打击资产阶级右派，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具体说，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威专家，老古董……什么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是指一般有缺点的人，是包庇牛鬼蛇神的人，牛鬼蛇神就是三反分子”。阎还以“组织革命化”之名，提出要对教育部门和专业剧团进行大换班、大清洗，称：“教师队伍问题多，家庭杀、关、管的占40%，问题严重的占10—20%可以清洗，省委准备从高中毕业生、在乡知识青年、工矿中抽五千人顶替”。18日，阎红彦、孙雨亭再次强调高校要“普遍揭发”“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不论是谁都可以揭”“有什么揭什么”。26日，阎红彦从西南局返回，在常委会宣称“全国要抓40万右派。”问：“57年我们搞了多少右派？”孙雨亭、岳肖峡（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答：“12000多”。阎道：“云南这么大个省，不抓他万把反革命还行！这次恐怕不止此数。”接着会同孙雨亭制订“大逮捕、大清洗、大换班”计划。¹

与高校运动高歌猛进同步，各专州县均派出工作组进驻县第一中学，其余中、小学教师则集中整训，大搞“集中营”、“拘留所”、“逼供信”，不少教师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牛鬼蛇神”，以备清洗开除。许多县被整教师达总数的20%以上，人人自危，满校恐怖，不少教师被逼自杀或逃跑。²

都可写大字报；揭发要采取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既要揭发历史反革命，也要揭发现实的反革命”。

昆明工学院是工科大学。工科学生作风务实，尤重理性推演，从北京到外省，各地文化大革命最先的造反派从而后来的领头羊，多属工科大学，如北京的清华、北航、北地，外地的西安交大，重庆大学……等等。云南亦如此。昆明工学院的刘光华开始怀疑，工作组老叫“揭发问题不限定框框范围，听到的，看到的，或是想到的，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写大字报；党内的，党外的，一般党员的，教职工学生中的，只要你认为问题是问题都可以揭发”，为何唯独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师生们开始怀疑工作组的作法是违背文化大革命大方向的，实质是把运动的大方向变成为整群众，整老百姓。”刘光华还发现：

¹ 林超民博客《补拙野史》“大逮捕 大清洗 大换班”林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副校长

² 同上

工作组动员师生写大字报，但他们选定的依靠对象是不写大字报的。当有大字报贴出后，这些人都拿着小本本跟在后面搞摘抄。摘抄的内容则工作组搞摸底排队，而被打成了“右派”、“反革命”都不知道。

昆明工学院全校有教职工670人左右，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全校教职工中抓出的牛鬼蛇神达200人左右。工作组就在学生的依靠对象中挑选部分学生成立“牛鬼蛇神专政队”监管这些“牛鬼蛇神”……这些人被送进牛鬼蛇神专政队后，手臂上戴着写有自己罪名的白袖套，白天在校园内，由戴有红袖套的专政队员押着，扫厕所，挑大粪，扫马路，种地等……上厕所也得集体定时去……家属小孩不准探视……这个黑监狱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由造反派组织宣布撤消，这200多人才获得了自由。

据后来云南群众组织“八二三”派情报机构“风展红旗”实时编写的《昆明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统计，云大、师院、工学院、农林学院、医学院五所高等院校的3470名干部及教职工中，被大字报点名围攻的达1867人占53.7%。¹

工作组打法之四，是重点圈定名人、名教授组织“群殴”，以造轰动效应，除已落马的高治国及被株连的夫人黄某（数学系总支书记）、秘书沈某（政治系总支书记），工作组又抛出一枚软柿子：副校长李广田。李乃著名文学家、诗人，批起来最博眼球，李先生著作等身，随便挑几篇文章摘几句话来批倒批臭，实在绰有裕余。校党委将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发表的“有问题的文章”汇编成册发到全校各班组供批判用。其中散文《花潮》最是有名，专赞昆明圆通山樱花，写得文辞绮丽，满纸馨香。圆通山樱花潮乃昆明一大春事，文革后，受益于李文影响的圆通公园干脆将该文勒石刻碑，以助游兴，经济效益多多。文革批判，皆取文中所引古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还有“天气冷了，想要一顶帽子”的文字，打手们遂将此文联系大跃进破产后的经济困

¹ 参看“风展红旗”编写的《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部分）》。“风展红旗”系“八二三派”情报资料机构，其实时编写的《大事记》共三册，约16万字，按照时段，分别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主席“就地解决云南问题最高指示”下达以后》《血雨腥风二十天》《中央“九五命令”下达之后》《昆明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大决战》和《迎头痛击右倾翻案妖风》六个部分，时间跨度为1966年5月15日到1968年1968年8月14日云南省革委成立。除“大事记”外，“风展红旗”尚编有《毛主席无限关怀云南人民》（中央和中央首长对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册。“风展红旗”所编“大事记”，除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多从派性出发，经笔者对比参照，所记事实基本可信，许多资料与官方材料基本相符，只是更为详细。

境，上纲道：说“春泥”，便是暗表“反党的决心”死而不改；“帽子”则是要“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冷”则是影射1959年前后全党全国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的社会气候。大字报的结尾：“李广田不是想要一顶帽子么，给他一顶漏网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适”。7月19日的《云南日报》宣布，这是“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胜利”。李广田很快被送“劳改队”劳动、批斗，遭受两年多批斗，终于挺不下去了，1968年11月2日，对人说一句“士可杀，不可辱”，而后逃遁大学附近的莲花池，自蹈清波而亡¹。

整人运动越来越热闹，云南大学原规定张贴大字报的小礼堂“至公堂”已不敷使用，校党委遂决定大字报可张贴至学生食堂墙壁，以便学生边吃、边看、边议。自此大字报中点名批判的教师、职工、炊事员……越来越多，所批内容也越发离奇。比如，中文系某老师讲授《现代汉语》，说“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人类的语言。如果有一天太阳熄灭了，人类不存在了，人类的语言自然也就消失了。”因为“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此语就成了该教师“恶毒攻击红太阳毛主席”的罪状；讲授《古代文选》某老师，为通俗易懂，遂将古代官吏被贬谪和现代干部下放作类比（还专门说明了此二者性质不同），这就成了对共产党的干部下放政策心怀不满；还有卫生科某医生对前来投诊的女同学“望闻问切”，如此流氓作风更该挨批斗……”

再看昆明工学院的情况：

文革时昆工共5个年级约4000人，其中高年级66届、67届和68届的学生在1965年就全派下农村搞“四清”去了，留在校内的两个低年级（69届、70届）同学约1250人左右，运动初期被工作组定为“右派”、“反革命”的竟多达423人。占全部学生人数三分之一。为了控制这三分之一，工作组将学生编为三人小组，日常生活规定必得集体行动，每个小组由工作组确定的“依靠对象”任组长，“中间分子”任副组长，“右派”“反革命”一人则夹在中间，称“两红夹一黑”。工作组规定：所夹的“一黑”不许单独行动，走哪里、做什么事，包括上厕所，都必须给组长报告。1968年6月昆明工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云南省公安厅四处把文革初期工作组报送的专案材料退回了该校革委会，所报送的“右派”“反革命”材料，正好就是对应的423份。

¹ 刘兴育编《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

或问：从组织“四月提纲”到批判“四月提纲”、从重用高治国到批判治国、再到批“三家村云南分店”，到整饬《云南日报》、到工作组进校对学生、教师无端迫害……闫红彦的形象为何与履新滇地时殊若云泥？一个体恤民意，连吃饭、盖被子、用筷子都关注入微的清官暖吏，为何一到文革顷刻变脸，成了蛮不讲理、文过饰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恶吏？笔者答云：革命者与技术官僚品格之巨大差异也。革命者造反，只关心对真理的价值追求，为此可舍弃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权，需要的只是官场技巧，关心的只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计算、风险和收益之间的选择，为此可舍弃真理。如果说阎红彦初到云南，尚存几分革命时期的善恶之心，那么经过1960年代的折腾，已修炼得日臻老道，在风高浪急的文革大海，这个云南“船长”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犹豫将可能造成威胁的人扔去大海喂鱼。短短几个月，高治国、李孟北之属尚可说打就打，云南大学的黄某、鲁某这样小不点儿、教师……当然难以幸免

毛泽东本来就要天下大乱，整饬当权派，事情被全国的阎红彦们这般一弄，事情就全搅黄了，难怪一回北京他就生气，说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¹

九、以攻为守

闫红彦跟着刘少奇的指挥棒搞“二次反右”，忙活两个月，工作组在各大大学、文化系统、中小学，甚至省委机关制造出一大批仇恨者，弄出了一个让毛泽东“感到很难过”的“冷冷清清”、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这恰恰是毛泽东最想要的。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开始动手开刀了。

1966年7月下旬，阎红彦奉命上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得知毛泽东拿工作组说事，实际是要对“五十多天”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开刀，果然慌了神，从27日至31日，他接连不断致电孙雨亭，“酝酿”是否从高校撤工作组？爱认死理的闫不无赌气地表示，说“云南的工作组没有打过一个反革命，问题的性质和北京工作组不同”。²

足智多谋的孙雨亭已深感危局。8月2日，他给各工作组打预防针抚慰，

¹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96页，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² 参看“风展红旗”编写《昆明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一部分）》

道：“撤了不要怕，右派领导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来打倒右派，左派就坚强了”“工作组在，右派暴露不够，左派锻炼不够”“工作组撤了，右派反攻也好，要引蛇出洞，混战一场有好处”。

两天后，阎红彦北京急电又至，告孙：“昨天清华大学开两万人大会，总理说，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又次日，得知全国各地已陆续撤销工作组，知道云南不撤断难过关，闫孙二人只好壮士断臂了，8月6日，孙雨亭到云大宣布：“云南工作组少而精，没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当时派也对，现在撤也对”。孰料两天后，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正式昭告天下，节节败退的云南省委无路可退，遂好以攻为守，决定让工作组重返学校控制局面，不叫工作组，改为“调研组”、“联络员”。8月15日，孙雨亭召集各大学工作组会议，作具体安排如下：“一、今后不要工作组，怎么领导运动？大家要想个办法；二、各校成立文革，工作组都要表态（支持），各校成立文革时，工作组一定去，一祝贺，二做点鼓励性的检讨，今后就更好了解情况”“选举文革筹委会，实质是争夺领导权”，会后，各联络员遂隐居幕后对学校运动操控。闫红彦还让副省长刘明辉一厢情愿宣布：“其它单位转入‘理问题，梳辫子’，‘搞思想革命化’”。10月份结束文化大革命。

高校学运已勃勃发酵，而今高压初释，注定要滚滚翻腾。8月7日，云大物理系二年级学生曹齐康、保荣卿的大字报《我们的疑问、看法和建议》横空出世，斥责省委工作组把云大文革搞得冷冷清清。二人公开怀疑工作组引导全校批李广田、高治国是玩弄阴谋、“舍车保帅”；大字报斥责选举“文革委员会”被工作组、校党委操控，师生没有选举权利和自由。二人提出，“校文革”选举工作应该暂停，要充分发扬民主，让师生推出候选人自由竞选。¹

曹、保立即遭到有组织的围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二人发出警告：“云大不同于北大”“充当‘政治扒手’是没有好下场的”云云。9日，外语系刘必新等9人写大字报《我们的看法》反对辩论中以势压人，500多同学在大字报签名声援，10日凌晨，校当局马上高调反击，再推一批大字报围剿曹、保，还将曹、保大字报冠以“奇文共赏之”之名印发全校“供批判之用”。11日，孙雨

¹ 林超民博客《朴拙野史》：“紧急座谈会”

亭、马文东急赴云大召开座谈会，孙明确定性：“说它（指曹、保的大字报）是反革命大字报，是毒箭也不过分”。曹、保二人的人身自由至此受到监控。

1

就在曹、保二人被围攻得最为囧困，几乎准备俯首就降之时，偏偏又跳出一条好汉“拔刀相助”：此人名唤方自清，物理系学生，出生峨山彝族农家，少数民族性格鲜明：敢说敢干，敢冲敢闯，性格耿直乃至胆大妄为，后改名“方向东”，并成为云南省一大派群众组织“炮兵团”司令，故而世有“草包司令”之称（或简称“方老草”）。方向东在舆情高压之下挺身而出，写大字报力挺曹、保，反对围攻，主张以理服人，进行真正的大辩论……方文一鸣惊人，霎时间，全校的大字报矛头哗啦啦又指向方某，骂他“貌似折中公允，实则与曹、保乃一丘之貉”云云，方虽成众矢之的，但彝族后生，本有政策关照，乃父系个旧锡矿工人，母亲家乡务农，“响当当”的“根正苗红”，一时间当局难以奈何了他。

北京风暴愈刮愈猛。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在天安门接见百万文革大军，接下来，大串联，各地炮轰、火烧已起，云南省委几个月政治高压溶炼出的仇恨已如岩浆待喷。坐在火山口上的云南省委，传统武库里能够翻找出来对付老百姓的的手段越见稀少。

8月20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到云南，并要求即刻传达。闫、孙及其同事被逼墙角。孙雨亭在省委会议上说：“现在学校闹得很厉害，机关再乱起来，可不得了。已经传达了的，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暂时停一停。”阎红彦顷表赞同，轻描淡写道：“毛主席的大字报是针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不能随便套，没有党的历史知识的人也看不懂”，并慌不择言：“毛主席《炮打司令部》，首先要炮打工交口司令部！我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

机关本是闫红彦后院，五月以来，批高治国、批李孟北，省级机构尤其宣传部门早已成了是非窝，挑起许多矛盾，尤其省委宣传部被称为“烂了的单位”，还组织了庞大工作组进驻，搞成“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试验田”，十一中全会前后的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省级机关参加文革运动的8900人中，

¹ 刘兴育编《历史的见证(云大文革史料选编)》

被列为重点就有 1900 多人，占 20%。在大字报上被点名的干部就有 4400 多人占 45%。现在，阎红彦说他“说的话也算对工交口的一张大字报”，机关的情况更不可收拾。洪水已至，管涌在堤坝到处出现，只等某一潜流突破，整个堤坝就要溃塌。缺乏谋略的陕北莽汉闫红彦，现在还在给自己添乱。

十、“八二三”风暴

云南文革史上涌来的第一波洪流，来自一封普通的北京来信。

8月22日，昆明农林学院学生周鸿收到清华大学王姓同学一封信。信写得很平实，一个煽情的形容词也没有，亦无流行的大喊大叫。偏偏就这一封信，把老实巴交的云南大学生文革激情一下子点燃了。有人称该信为云南“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实不为过。该信全文如下：

周鸿同学：你好！

来信已收到，那是十五日刚从天津回来的时候。现在北京高校大搞革命串连，南下北上，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不少地方的同学写信来求援。有的人到西北，有的人到广西、广州！……西藏来的两个同学回西藏，新疆的同学也回去了。在赴津四天的串连中，收获颇大，我们由昆明来的同学也想回昆明搞串连，但由于太远，花费时间很多，就决定不轻易乱动。想先对昆明的文化革命运动情况了解一下，根据你们那儿情况，若有必要，就取得革委会的同意，即可返昆，因此，希望你们能把整个昆明高校文化革命的情况群粕地向我们介绍一些，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1. 群众发动得怎样？大家是否敢打、敢冲、敢摸老虎屁股？大字报情况怎样？（数量、内容）我们这儿群众现在发动起来了，大字报多极了，北大、清华每天都有上万的人来串连，看大字报，热闹非凡。到天津时，看到天津高校大字报不太多，原来大都贴在室内，和北京一比，颇有冷冷清清之感。希望你们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作一个介绍。

2. 炮轰司令部做得怎样？党委的盖子是不是完全揭开了？我们这次上天津，天津高校不少都揪出了党委几个人，但盖子未完全揭开。如天津大学揪出了原党委书记和两个付书配，后来（64年开始）的代党委书记及一些党委书记掌握了校文革的大权，运动群众，划了不少框框；定调子，

严重阻碍运动。这次我们去，就是和他们一起与当权派斗，受到了保苏庄（书记）派的围攻，十四日要返校时，被他们组织包围，以致没法回来。后来通过种种联系，把这样的反革命事件汇报中央，在中央支持下，夜里才返校。去天津一次，受益不少。现在天津高校的运动正往激烈进行。我们到天津大学，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八·三一”红卫兵组织，他们要罢苏庄的官，提出了“火烧天津市委，炮轰河北省委”的口号。他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八三一”红卫兵在学校里受当权派打击，他们几千人步行上北京，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火车接他们，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不少学校同学们有很大争论，如南开大学，大部分人保党委书记，一部分人要炮轰学校党委，少数人被围攻。

· 原北京高校工作组之所以把矛头指向同学，主要是同学摸了工作组这只老虎的屁股。你们那儿运动是否健康？揪出一个×××是否能证明？

（天津大学揪出李××这个大黑帮，也在《河北日报》上点了名，然而党委盖子并未完全揭开。他们“八，三一”红卫兵就是在揭党委，因而招来了保皇派的种种造谣、污蔑。）学校里现在为什么就变冷了？为什么把矛头对到了全部老师身上？为什么又揭发同学中的问题？

3. 昆明高校各校之间联系怎样？是否各校封锁消息？其他学校情况怎么样？是轰轰烈烈，还是比较冷冷清清？在全国这样的形势下，一切牛鬼蛇神总是想蒙混过去，总是想打“死狗”“转移目标”，他们总是想拉出几个“死狗”来打，企图蒙混过去。

4. 十八日天安门大会上，很多外地学生都是到北京求援的，都是自发来的，唯独没有西南的，因此大家对西南情况更不了解。清华、北大都住满外地学校来的人（几万）。有的地区对同学控制得很紧，不让同学搞串连，有的都是偷着跑到中央来汇报情况的，很多地区有不少反革命事件（如兰州、广西……），大家一听到，都气愤极了，马上去支援。

本来我们想写大字报到你们那儿去煽风点火，但由于不了解情况，若无针对性，泛泛而谈，既费时间，又收不到效果。因此，暂时不写，先了解情况。

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大闹团中央，把胡克实、

胡耀邦、胡启立、王照华等粒下了马，中央已改组团中央。革命小将们的造反精神给我们很大的教育，他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谁坏，就打倒谁，所向无敌。毛主席参加红卫兵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现在各高校也在成立红卫兵组织。昆明高校的革命造反精神怎么样？希望你到各校了解一下，串连老同学，马上把情况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决定是否有必要返昆！

我们昨天晚上在北大决定想串连，今天就写信向你们了解情况，你们一定要马上回信，文化大革命中时间很宝贵。若有必要，你们一回信，我们一收到，必定马上动身！

几十年后，周鸿女士已是云南著名的生物学家，远离政治，一门心思致力于环境保护，成就卓然。对于远逝的文革旧事，尤其那封《北京来信》，周女士总是三缄其口，一笑而已。当初她却是很在意的，不仅在意，简直搅得她热血沸腾，一夜未眠。一年后的1967年8月23日，她就此信在《云南日报》专门著文纪念，题目是“革命更知北京近，造反倍觉毛主席亲”。文章称：那是“一封充满革命激情的信。”“这封信，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号召，把首都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天津小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革命口号，带到了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闫红彦及其死党长期禁锢封锁的昆明。”周鸿说，她“和同学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封信，深深为首都小将的造反精神所鼓舞，心里一遍又一遍地背诵着毛主席的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照当时云南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一系列迹象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云南省委就是大有问题。革命的烈火在我们胸中燃烧，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教导，起来造反了！起来造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了！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首都革命小将作我们的榜样，我们斗志昂扬，无所畏惧！这天夜里，我们怀着一颗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高呼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冲出校门，打破闫王殿的清规戒律，到全市的高等院校进行革命串连。我们和春城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摸了闫红彦的老虎屁股。从此，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火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春城越烧越旺，闫王殿在席卷春城的革命风暴中开始动摇。”

昆明工学院刘光华这样回忆那个难忘的日子：

八月二十三日一早，昆明农林学院的周鸿同学来学校点火，终于引爆了昆明工学院造反派心中被压制的烈火，冲散了校园内的沉闷空气，文革造反派冲杀出来了。

十时左右，我和其余的五十多名同学集聚在学校三号楼前开始制作“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就自动上街了。标语牌在队伍前开道，五十多人紧跟其后。队伍出大校门，经西站，昆师路，到小西门时发生了意外情况：从街道两旁突然冲出200多名穿工作服的工人，冲进学生队伍，砸烂标语牌，殴打学生。学生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撕破了。工人们还边打边骂“你们这些学生，共产党把你们喂饱了，敢造反了，省委是能够用炮轰的吗，市委是能够用火烧的吗？你们这伙学生完全是反革命”等等。学生们手中没有了标语牌，只好跑回学校，诉说上街被打的经过，在校园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和愤怒。于是，又有更多的人参加进来，重做标语牌。这次做的标语牌是两个人才抬上一个字的。吃完午饭，“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大标语开路，后面集合了近两百人同行。队伍途径西站—昆师路—小西门—东风西路，到近日公园时，上午的一幕又出现了。仍然冲出穿工作服的工人，再次砸烂了标语牌，打伤了学生。不服气的学生们再次跑回学校，重做四个人才能扛一个字的大标语牌。除“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外，又增加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下午三时左右，队伍又出发了。这次人数达四百多人，其中还有昆明冶金工校的学生。标语牌居中，学生们手挽手前后左右保护着，穿过近日公园，经南屏街，东风东路，最终把两幅大标语牌安放在昆明市委大门口，然后操作整齐的步伐，怀着胜利的喜悦，呼着口号，回到学校。

八月二十四日，校文革委员会无法控制学生的行动。大多数学生自动组合，三五成群，一拨一拨地抱着纸张，提着墨桶，抬着面浆，冲上街头，写大字报，刷大标语，矛头直指云南省委，昆明市委，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全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等等。昆明街头，机关门口，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昆明沸腾了¹。

昆明工学院很快成为造反派力量最强大的“八二三派”大本营。后来成为炮派大本营的云南大学学生杜德威也有相似的记忆：

8月23日，周鸿、侯树勋等40余名同学到云大、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等大专院校串联成一千几百名学生（以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占大多数），高举毛泽东的画像和语录牌上街游行直抵云南省委大院，被省委负责接待的干部安排到省委礼堂就座休息。大学生们强烈要求省委领导人接见并回答问题。在云南文革史上，他们首次以如此壮大的声势，响亮地提出“炮轰云南省委、火烧昆明市委”的口号，开始，省委负责人不仅避而不见，还暗中派出记者和便衣警察偷偷拍照收集资料，以备秋后算账。但这一千几百人的队伍一直守在省委礼堂里，群情激奋，口号声此起彼伏，毫无要撤退的意思，弄得整个省委大院不得安宁……晚上11点左右，先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等人、继而是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见了造反派。在回答问题时阎红彦不得不承认这一天学生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于是以昆工为主的近二千名造反派胜利撤走²。

事件发生当天，云南省委正开三级干部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偏偏会会议头一天，几千大学生便呼啸闯来搅局。这个突发事件给对毛泽东文革意图摸头不着脑的官员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场课。官方记录如下：

昆明农林学院的这名学生看信后，马上进行串连活动，当天下午就把来信抄成大字报贴在学院食堂门口，晚饭后又聚众宣读了毛泽东写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一时间轰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他们指责：“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与党中央的指示背道而驰”，认定“云南的党、政、财、文大权落到了以阎红彦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手里，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把云南搞成水泼不进，针插不下的独立王国”，扬言“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云南”，决定“杀出去，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把阎王殿（指以阎红彦为首的省委）砸个稀巴烂。”

¹ 刘光华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未刊稿）

² 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雨映滇池》

当晚，昆明农林学院部分学生把来信赶抄成大字报，印成传单，还写了一份呼吁书，质问省委13个问题，抬着毛主席语录牌、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分三路连夜出动串连，一支150多人的队伍当晚“杀向省委”。到了省委机关，他们指名要见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一位省委副秘书长出面接待，把他们请进省委礼堂，听取他们的意见。学生们一听是副秘书长接见，便不理睬，各自读毛主席语录。22点25分，周兴出来接见。周兴表示欢迎同学们对省委提出的批评。学生们质问说：“为什么不挂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为什么没有一张毛主席语录？”批评“云南省委贼胆包天”，质问：“阎红彦从北京开会回来，为什么不讲北京造反派的革命经验？”，“8月18日毛主席在首都接见百万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云南的代表参加？”，“阎红彦为什么要封锁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周兴回答说：“你们怀疑省委有黑帮，你们拿出材料来。”，“省委是正确的，红彦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们要求上北京的事，中央有通知，怎么去还要商量。”学生一直到8月23日凌晨2点多钟才离开。

另一方面，昆明农林学院一支70人的队伍到云南民族学院、昆明师范学院、云南大学、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串连，除云南大学学生表示冷淡外，其他院校的学生表示响应和支持。串连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5点多钟。

8月23日上午7点多钟，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冶金工校、昆明师范学院、云南省中医学院、云南农业大学和昆明一些中学的造反派约5000人，抬着“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标语牌上街游行示威后，分9批先后进入省委机关大院。他们的口号、质问、所提要求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提出“要求上北京，要见毛主席”、“要阎红彦出来接见”。当日，阎红彦正在主持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由于学生到省委大院造反被迫休会。阎红彦和周兴、孙雨亭等省委领导人来到大礼堂接见学生。阎红彦耐心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同时表示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并指出：“北京学生的行动，并不都是对的。有好的经验，

也有方向路线错误。”“我们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经验，我们只有造国民党反的经验。但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老实说，我们是没有经验的。怎样造反，还是要靠我们独立思考来解决这个问题。”聚集在省委礼堂的学生在阎红彦等省委领导耐心的开导下逐渐散去。个别人开始时曾寻机生事，气势汹汹，甚至企图向阎红彦身上扔大字报，最后，只好甩了大字报而去，这就是所谓的“八二三风暴”。这一“风暴”后来被造反派称为“春城风暴”、“春城人民的骄傲”、“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实际上是全省城乡社会动乱的起点。¹

关于“八二三”事件集体记忆的表述还有很多。被“革命年代”刺激得头脑热昏的年轻人，后来还模仿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编排了一出《春城风暴》对“八二三”故事大加赞美。从此，“八二三”这个数字注定成为云南人永远无法抹去的梦魇：或因社会高压的暂时缓释而快意，或因由此引发的巨大灾难而痛悔。

十一、力不从心的反扑

云南和全中国一样，建国以降，一拨接一拨运动堆积的政治高压让多姿多彩的边地社会鸦雀无声，而暗中壅塞、需要化解的矛盾、需要宣泄的情绪和需要疏导的恩怨却越来越多：领导和领导、派系和派系、领导和百姓、百姓与百姓……从鸡毛蒜皮到生杀予夺。与此同时，通过共产党、共青团、工会、妇联，包括少先队这些社团组织，将世俗生活全部掌控在斯巴达军事共产主义式的集体框架之中，不同行业、不同层级之间（包括大学各专业、各年级之间），基本上不可进行正常交流（更别提结社和集会自由），社会矛盾的解决找不到任何出口。

从8月23日这一天开始，情况变化了。毛泽东直接交给群众一个舞台、一套阶级斗争的武器，于是一夜之间，情绪被点燃，矛盾被激化，人人成了批判家，全都跳到台上争吵、谩骂、杀声喧天，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几千学生冲击省委大院闹事，还逼得不可一世的省委书记承认对方是“革命行动”，

¹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51-55页

多解气！

为了在与当权派争斗中形成集团战斗力，几个高校的大学生们首先开始了频集的骚动、串联。823事件当晚，昆明工学院以汪首学为首的七个学生就成立了云南文革的第一个战斗小组“金棍子战斗小组”；7天之后，云大和师范大学的陈立新、李木昆成立了“反修战斗队”……接下来，五花八门的学生战斗团队便像雨后林间的蘑菇，满世界疯长。官方统计资料称：“从‘八二三风暴’后至9月中旬，昆明工学院出现了‘延安红卫队’‘井冈山红卫队’”、“炮轰战斗队”、“八二三无产阶级造反队”、“八二三战斗队”、“向阳赤卫队”等13个组织，到10月20日，昆明工学院部分学生成立了‘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团’，成员23人，一个月后，成员迅速发展到上千人。”官方党史资料还记载：“9月4日，云南大学成立了‘云南大学‘共产党宣言’战斗队红卫兵’和‘毛泽东主义捍卫小组’2个组织，以后几天，又相继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战斗队’、‘反修战斗队’、‘捍卫毛泽东主义前卫小组’、‘毛泽东主义敢死队’等组织。9月14日，上述组织联合成立了‘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昆明师范学院也成立了‘昆明师范学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到‘九一四风云’前后，‘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发展到100多人，成为当时人数最多的造反派组织之一。¹。这些组织成立时间、人数、活动情况，官方记载比民间资料和当事人记忆要详细得多，想必有准确原始材料佐证，而这些佐证当为官方派人暗中搜集、被造反派称为“黑材料”的。

云南省委的官员，以及党国思维根深蒂固、或早被政治风浪吓破了胆的大小干部，深知事情严重性，一心只巴望马上开始“二次反右”，然后天下太平。可是偏偏就在事发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明确指出：

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

¹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48页

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这些话像是专门冲云南省委说的。如今阎红彦们能够做的，就是抓紧灭火，拖延时日，等到毛泽东感觉事情闹大了，发令反击。23日“三千会”被搅局，24日立即将头天闹事的现场录音作为“反面教材”发与会代表进行思想试探和心理恫吓；会议结束前的26日，孙雨亭讲话，再次明确以对待“八·二三”事件的态度将阵线划为左中右：“左派肺气炸了”“中间派无动于衷”“右派暗中窃喜”，最后，第四类最是危险：“里应外合”。所谓“里应外合”，系指省委机关内部（主要是宣传部），有一帮年轻人蠢蠢欲动¹。

三千会结束次日，省委召开书记处书记会议讨论形势，阎红彦强调：“他们想制造一个事件，拿着几件血衣上北京，那些谣言不值一驳。”同日，闫红彦还带领书记处全体书记，赶赴造反大本营昆明工学院参加精心组织的“全校师生大会”，对823事件还以颜色。²书记们刚在主席台落坐，早已埋伏就绪的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民族学院等大专院校“左派师生”便一涌而出，抬着“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市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反革命”“右派翻天，坚决镇压”“坚决镇压反革命”等横幅和标语牌，高呼口号包围昆工礼堂示威，时长达半个多小时，等游行队伍离开，昆工校文革主任才宣布大会开始。先由事前安排的5人发言。第一位发言者是实习工厂

¹文革前，省委机关曾调进一批大学毕业生。八月中下旬，这些年轻干部便开始贴大字报，提出不仅斗争高治国，还要继续追根省委。这些年轻人后来均成为省级机关造反派骨干。为首者金华，后来当了省革委写作组负责人、胡文龙当了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揭批查运动均被整肃，金回大理老家关图书馆，胡回建水县六中教书。

²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53页。

工人，刚报过发言题目《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就是反革命》，顿时满堂大哗，纷纷站起来要主持人答问，发言者顾不得骂声汹汹，只顾照本宣科念稿，又招来阵阵反怼声浪：“坚决炮轰省委，火烧市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念稿难以为继，主持人不得不提前宣布请闫书记讲话。闫依旧刚愎固执，抽象肯定“同学们要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如果省委市委有错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我看应该轰，应该烧；”接下来又是乡村怨妇毫无说服力的誓言：“如果说云南省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我个人现在还没有这个觉悟，省委也没有这个觉悟，说省委错了，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认识水平。”省委书记讲话大失水准，又激起学生更大反弹。两天后，昆明工学院的“篮球场公开辩论会”，被校文革选定在827大会上发言的5人全体反水，上台揭露事情真相：校文革如何将写好的发言稿交给他们念，要他们呼什么口号，并明确说明这是省委的意思等等，5人皆向造反派道歉。¹

群众既然对省委不再唯唯诺诺，那么，用“组织手段”让基层领导去直接弹压总该有效果了。民间资料《凤展红旗》记录了云南省委的一大手段很有趣：云南省委密令昆明工学院院长赵凤歧，要他“必须立即将群众运动镇压下去，否则就‘开除党籍，直至逮捕法办。’”

此事从多位昆工学生的口头和书面回忆中得到证实：八月二十四日晚，孙雨亭打电话给昆工党委书记兼院长赵凤歧，责问：“是怎么管你的学生的？你为什么要把你的学生放到社会上来？”赵答：“工作组进校，我就靠边站了，我管不了嘛”孙命令：“从明天开始，你把你的大校门锁起来，不许学生上街”，赵反诘：“锁校门不妥吧？”孙道：“你还要不要你的党籍？你如果不要你的党籍了，你就不要锁了；你如果要党籍，从明早开始就把校门锁起来”。

赵凤歧，河北人，年青时代参加“一二九”运动，后投奔延安，解放战争时随陈（赓）谢（富治）兵团到贵州。1954年任贵州大学校长。1956年成立昆明工学院，赵调任党委书记兼院长。文革开始被工作组夺权，后因同情本校学生造反进而支持“八二三派”（该校自始至终只有一派），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被学生鼎力推荐，出任省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在多位昆工学生记

¹ 刘光华回忆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实践和官僚集团的反攻倒算》第36页《两场大辩论》。

忆里，赵书记已然是他们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省委领导如此强硬下令赵凤歧锁大门，基层领导焉敢不执行？8月25日，昆工大校门果然锁起来了。刘光华带一帮同学前去找院长论理，赵自曝苦衷并暗中提示：“我锁了大校门，並沒有锁学校的后门和侧门，你们照样可以出去嘛。如果到了无奈时，我再锁了后门和侧门，学校四周的围墙都是土基砌的，你们推倒照样可以出去嘛！”。大校门果然只锁了一天就难以为继，徒给无计可施的省委领导留一笑柄。1978年“揭批查”，赵凤歧被认定为“卖身投靠”的老干部，不得不逃离云南是非之地，重返贵州任贵阳大学校长兼书记。¹直至1988年病逝。

像赵这样不听招呼的党员自属少数。对于更多习惯对上司言听计从的基层党组织，他们的“二次反右”战车继续隆隆前进。党政干部和便衣公安干警被大量派出，对学生的大字报、传单进行拍照抄录，对好事者进行跟踪盯梢，搞“黑名单”“黑材料”。这些手段他们早就驾轻就熟。823的始作俑者周鸿成了第一个盯梢对象。据历史学家、曾任云大副校长的林超民先生回忆：那张名为《北京来信》的大字报刚在云南大学学生食堂外的墙壁上张贴，云大政治部即派人拍下照片，“当天晚上十点左右，云南大学党委政治部主任尤正发召集十来个同学到党委会议室开会……他对大家说，今天到各大学张贴《北京来信》大字报的周鸿是反革命子女。她的父亲周泳先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国民党特务。今天晚上召集大家来就是要把周泳先的黑老底抖出来，让大家明白，煽动炮轰省委的究竟是什么人。他把材料交给一个老师，由这位老师大声念出来，十几个同学同时照着写下来。《请看周泳先的反动面目》的大字报很快抄写好。尤正发叫大家在12点以后，分头到各大学门口张贴。”²昆明工学院“金棍子战斗小组”的发起人汪首学及7名同学，自然难逃当局法眼，后来昆工学生从公安局抄回“黑材料”，侦查工作果然做得仔细。材料共1800多字，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汪守学的材料”里载有家庭主要成员及政治面貌：“其父汪成泽除解放前当过一年伪兵外”“三叔，地主分子，表现不好，社教时被斗”“大舅，

¹ 汪首学回忆录《犟牛红卫兵》第26页。

² 林超民博客。云南大学校史办P266对此事还有进一步的资料，更为有趣：“大字报刚刚贴出去，马文东在电话上指示胡泮生把大字报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字样涂掉。尤某某立即坐小车去改。紧接着，马文东又传达闫红彦指示，要把大字报撕掉。这一次任务是谢某某坐着省委办公厅的小汽车，跑遍全城去执行的。

解放前被拉壮丁，无音信”；“本人的主要问题”则有“中学时对同学态度生硬，政治思想水平较差，工作方法简单”“文化大革命中积极主张‘炮轰省委’，与廖明剑、钟晓云、沈云高等组织金棍子战斗小组。第二部分“金棍子战斗小组的变化及活动情况”则详细记录了该战斗组写了多少张大字报，什么内容？都贴在了某处？第三部分“几个成员的政治情况”，无非是某人“其父1942年曾参加国民党，为一般党员”“祖父XX，地主分子，曾任伪政府会计科长，已病故”等等。¹

当局愈益蠢笨的做法徒自增加群众的仇恨和反感，进而为造反队伍催生了更多后备军。

1965年，云南省委曾将昆工三个高年级的学生²和大部分教师派赴农村参加“四清”，为了灭火，省委认为抓紧将这些师生调回学校大有助益。这批人返城前，省委派专人前去对这些师生进行了集训，注射政治预防针，说是八月二十三日以来，学院出现了反革命事件，一股反革命右派势力妄图翻天；此外，还特别强调自打文革以来，省委如何一直正确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要返校师生密切注意阶级斗争尖锐性和复杂性，站稳立场，旗帜鲜明地同反革命、右派分子作坚决的斗争，等等。

一心巴望师兄学姐回校助战的刘光华这样记叙当时的情况：听到高年级老大哥、老大姐们要回来，校园内一片欢腾：

在校师生们制作了各色小旗，成群结队去学校大门口排队，成夹道欢迎之势：从“三家巷”³一直延伸到西站……望见一辆接一辆的大客车过来，欢迎的师生群情激奋，高呼口号：“欢迎老大哥，老大姐凯旋归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等口号，可是大客车内的师生们却一个个捏紧拳头，纷纷伸出车窗外高呼：“誓死保卫省委，誓死保卫市委！”“炮轰省委，火烧市委就是反革命！”“右派翻天，坚决镇压”……夹道欢迎的师生真是伤透了心……开始骂起来，哗啦啦地一下子散了……

¹ 汪首学回忆录《犟牛红卫兵》第9页。

² 昆明工学院系五年制院校，三个年级基本上占去学生人数的三方之二。

³ “三家巷”指昆明工学院、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之间的一条公共通道，借文革前广东作家欧阳山著名小说《三家巷》书名名之，昆明工学院的学生多由此路进出学校，文革肇起，该路成了偏于保守的云大和师院学生围堵昆工造反学生并与之辩论的最佳地方，窄路一时成了昆明的“海德广场”，造反势力和保守势力每日在此辩论不休。关心国家大事的市民多来此凑热闹，或围观，或参辩，不舍昼夜，蔚为壮观。昆明工学院师生因人数单薄，常常倾校出动迎战。

有的人甚至把校园内贴好的欢迎大标语也撕掉了。

“四清”运动本是文革预演。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二十三条”开宗明义定义：“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批师生乡下实践一年，对于文革同样重点整党内走资派的定义顺理成章很易接受。果然，他们与低年级同学进行了时间不长的调查交流，很快便站到“炮轰派”一边，明确表态：云南省委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大方向错定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是革命行动……云南省委企图调回人数众多的高年级学生弹压低年级学生，没承想调回的队伍很快调转枪口，对准了他们自己。

共产党政权本属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合二而一，且前者权重高于后者。文化大革命，最高领袖毛泽东将精神意志不断通过报纸和其他方式直接交给造反群众，当权派虽然依旧掌握着世俗权力，并据此对抗以图自保，已力不从心，进退维谷。

昆工高年级师兄返校，为云南文革萌生出一个必须标明的重大事件：机械系一位极具号召力的精英人物宣布造反了。此人名黄兆其，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毕业生，文革前考入昆工，师从著名机械专家、中国振动学科创始人屈维德副院长做研究生。文革前研究生极为稀缺，在高校校园，这种身份本身就具有天然的号召力。返乡返校，黄的政治认识转换最快，并于九月下旬带头成立了“昆明工学院井岗山红卫兵战斗兵团”，这个兵团成了其时昆工一百多个战斗组织中最大的团队。他对政策的准确把握、思辨的缜密和人格魅力、行动能力使他很快成为了整个昆明工学院的旗帜。12月23日，在黄的主持下，昆明工学院11个战斗团队联合成立了“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成为了全省八派的核心。

十二、“破四旧”：转移斗争方向的输诚之举

云南“八二三”造反运动发动当日，《人民日报》正好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置顶的，即前面提到的《工农兵要支持革命学生》，该社论显然让省委当权派大感晦气；随后一篇全文仅400余字，却让当局找到一些安慰。社论题名《好得很》，文章高度赞扬北京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

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文章指出：“北京解放已经十七年了，可是，在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长期把持、压制下，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为我们伟大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社论让身处困境的云南省委大受启发。边疆故地，“四旧”何处不有？比内地多得多呢！扫起来一无难度，二可表明云南省委和北京市委完全不同，绝非资产阶级“长期把持、压制”，而是革命司令部；第三，造“四旧”的反，矛头直指死人古人和持有“四旧”的“阶级敌人”，自然就把斗“当权派”这个大方向顺理成章扭过来。

从《云南日报》8月27日新闻稿《用毛泽东思想改变整个社会精神面貌，我省各专州所在地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及其后连篇累牍的消息报道可知，云南大规模的文化破坏活动正是从23日社论发表后开始的；还有，不管是“行为艺术”（砸庙宇、古迹等）的“破四旧”，还是配套“抄家”、斗“牛鬼蛇神”，都是通过公安及居民委员会组织、点水，由学生（“红卫兵”）有组织实施完成的。

“行为艺术”部分，最简单的是改地名店名。《云南日报》新闻稿报道：“二十三日以来，玉溪、曲靖、昭通、文山、红河、思茅、丽江、临沧等专（州）所在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高举毛主席巨幅画像、毛主席语录牌，高唱革命歌曲，敲锣打鼓，到街头集会演讲，贴革命大字报，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革命小将们说……一定要堵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切孔道……让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个旧市的红卫兵和红河州各县在个旧的红卫兵，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三天以来，冒着大雨，活跃在大街小巷……把带有封建色彩的街名，改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曲靖把“文昌街”改为“革命路”，把“土主街”改为“红星街”。昭通把“辕

门口”改为“红日公园”。临沧的“孝祠街”已改为“延安路”。文山的“大兴街”有座“大兴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人员曾居住那里，因而，红卫兵们提出把“大兴街”改名为“反帝街”文章说“家住‘反帝街’的贫下中农代表杨宝刚说：‘反帝街’这个名称好得很，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我们就要反帝，要一赢反到世界上消灭了帝国主义为止”临沧县商业部门的革命职工，把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光利茶水室”，改为“工农兵茶水室”；个旧市的商业革命职工，砸碎了以资本家名字命名的“康庄药房”招牌，换上“人民药房”四个大字。各地红卫兵们还向理发室提出倡议，不再理那些“阿飞头”“飞机式”等稀奇古怪的发型，向服装店提出：不再做那些“牛仔裤”和各式各样的奇装异服，向照像馆提出：不再照那些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妖气十足轻薄照片；向小杂货商店提出：不再经营那些敬种敬鬼的迷信商品。¹

昆明的情况比专州更威猛，有430条街巷和数以万计的商店被改名，96个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老字号”名牌商店被强行改名，著名的风景区“翠湖”被改为“红湖”，海埂公路改为爱武路……昆明最著名的糕点老字号《吉庆祥》不仅店牌被砸，“封、资、修”的点心名也一律改为“革命”名字：“金钱酥”的金钱二字实在太“资”，改为“小酥饼”、“沙琪玛”典型“洋名”，改为“蛋丝酥”、“芙蓉糕”：花花草草不革命，改为“红面糕”……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寺庙殿堂、风俗习惯等遭遇的冲击破坏更为疯魔。特别是作为昆明城徽标志的金马碧鸡坊被拆除捣毁。大批珍贵典籍、古玩、书画遭烧毁捣烂，更是无法恢复。

云南少数民族种类最多。民族特需用品被勒令停止生产销售，甚至他们的穿着、发式、民族风俗习惯、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当作“四旧”扫掉。不少庙宇、道观被强行关闭或砸烂，神职人员被赶走，僧尼被勒令还俗，经文被焚毁。许多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全部被毁，有的受严重损坏，如著名的鸡足山金顶寺铜殿、大理元世祖平云南碑、丽江忠义坊、安宁县法华寺石窟、潞西凤平佛寺与金宝塔、中甸归化寺、保山卧佛寺、腾冲来凤寺等。德宏、西双版纳、临沧等地的佛寺，几乎全部被破坏。²

官方资料还记录：非法抄家、游街示众、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勒索财物

¹ 1966年8月27日《云南日报》

²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46-47页

等违法乱纪现象普遍发生，仅昆明市就有 1749 户被非法抄家，包括被保护而住于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 36 户也被批斗和抄家。据不完全统计，全市被抄走的财物有黄金 4800 两、银圆 2.99 万元、珠宝玉器 1.36 万件、现款 9.84 万元、有价证券 93.73 万元、珍贵工艺品和历史文物 3613 件。破“四旧”的这些行动，严重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造成了严重后果。¹据亲自参与“破四旧”的红卫兵回忆，他们的全部活动，都是按户籍民警和居委会主任、治保委员“安排去办。由她们把我们一一带到被抄人家的门前，当门敲响之后，她们就迅速隐退了。这也是事先商量好的，据说这是为了阶级斗争的需要，为了便于她们今后能更好地开展工作。”闯进民宅后要干的，自然是翻箱倒柜，砸墙凿壁，乱搞一气。凡金银首饰、古玩字画、香炉神龛、身着西装的发黄旧照片、民国时的纸币、青天白日旗图案、“变天账”、封建迷信活动嫌疑书刊等等，统统作为“战果”交给居委会同时上报给校红卫兵大队部，一些“封资修”文学作品，如《茅盾文集》、《巴金选集》之类，现场一把火烧掉，然后对牛鬼蛇神及其家人训斥一通，无非是警告他们切不可乘文革之机轻举妄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接受改造云云。²云南大学校医李云鏊作为被抄对象，他在回忆录《十年浩劫中的遭遇》中记录了“破四旧”中的遭遇³：

他们翻箱倒柜，把我的《圣经》等书籍、电唱机、照相机、我向人家借的打字机、斧头等物都列为“特务”的用具而搬走。他们认为这些东西还不足以证明我是“特务”，于是逼问我“电台”藏在哪里。我说我没有电台，他们不依不饶地对我进行斗争，又是打又是骂，还给我剃了“阴阳头”。他们实在逼不出所需要的东西……勒令我到校内农场去喂猪。

更加荒唐的是，在后来的批斗会上，强逼李医生老实交代“扫四旧”从他家中搜出的一只“小脚鞋”是怎么回事？“此时我才知道，对我这样严阵以待，原来是为了一只小脚鞋”“这只小脚鞋是钟梅（注：李医生夫人）的祖母穿的，确实很小，算得上是‘三寸金莲’。钟梅觉得好玩，就保存了一只。我如实向‘革命群众’说明情况，他们不相信，反复问我为什么只保存一只，另一只在

¹ 同上。

² 参见杜德威回忆录《文革风雨映滇池》。

³ 刘兴育《历史的见证》第 390 页。

什么地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去问钟梅。他们说这不关钟梅的事，让我老实坦白用这只小脚鞋和谁接头。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是在制造一起‘特务接头’案的天方夜谭……”

这样的“破四旧”和北京的“破四旧”相比，性质虽无异，但多有不同。北京“破四旧”，基本上是贵族红卫兵，在皇城根儿主动挑起的、丧失理智的疯狂暴民行为。搞所谓“红色恐怖”，以打人（甚至打死）折磨人为乐事。云南破四旧，则是深感自身危机的各级官员的政治表态，和以此自保的、有组织的大破坏。因地处边缘，边疆一线的破四旧周期拉得更长，延续到九大以后的全民营造“忠字化”环境。中缅边境盈江县，直到1970年，7个乡镇还组织了“数千名群众和640多名红卫兵，把各乡、社31个奘房、寺庙、教堂的尼佛偶像砸得粉碎，‘家堂鬼’‘天地牌’‘鬼桩’‘神树’被砸烂，旧‘经书’、旧小说被烧毁，就连世代相传的‘人情簿’也被说成‘维护封建婚姻制度的总祸根’，拿出来烧毁。仅新府乡就有250户群众把‘家堂’砸烂后，贴上了毛主席像（其余农户因领袖像脱销未买到），18个社做了415块‘语录牌’”¹。

十三、平庸的“三字兵”与“九一四风云”

1966年9月10日，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从四川秘密来到昆明。四川学生造反早于云南，8月15日重庆大学学生一起势就几千人，李亲往弹压，软硬两手，已见成效²。李亲来昆明面授机宜，云南省委大感快慰。资料载：

“下午，李井泉找阎红彦、周兴、秦基伟、孙雨亭等人密谈。晚上，在军区招待所召开了省委书记处会议。李井泉在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组织‘红五类’子女斗争‘黑五类’子女。布置播放由他带来的宣扬‘血统论’的录音。二、组织‘左派’力量，组织红卫兵。李井泉说：‘只要真正有几千个有战斗

¹ 盈江县委《关于分配试点简报》（1970年第一期）载德宏民族出版社《中国共产党盈江历史 第一卷第P160页。盈江县史志办公室编。

² 重庆大学815派学生领袖之一黄顺义回忆录（未刊稿）载：8月24日晚上约七八点钟，市委派人来把我、熊代富、查正理接去沙坪坝区委办公室。到了以后才知道是李井泉接见我们。陪同接见的有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廖苏华，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一见面，李就说：“你们是八一五派嘛！”他接着说：“你们去声援师专、建院，是革命行动。就像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一样……”。他说：“市委对这个问题反映迟钝，没有支持你们。辛易之同志是资产阶级老爷态度。我已经批评了他们，他们要向你们检讨，要向全市人民作检讨……”事后，重庆市委马上就制造一个假案“828惨案”，组织官办红卫兵对815派实施大围剿。

力的红卫兵就解决问题’。三、提出要控制邮电大楼、电台、报社、公安等要害部门。他说：‘机关大楼冲就冲，占了也不要紧，占了城市还可以到农村，无非打游击’。孙雨亭大受鼓舞，说：‘井泉同志一讲，我们思想开朗了，有办法了’。次日，李井泉召开保守派学生座谈会。会上，把‘八·二三’说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政变演习’。李并给云南省委定调子是‘正确的’。鼓动‘红五类’子女和‘黑五类’子女‘血战到底’，要‘几红夹一黑’。

“傍晚，省委书记处匆忙开会策划成立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与革命造反派对抗。指定赵增益¹出面组织。晚上，阎红彦指使秘书给陶铸打电话，要中央答复云南省委是不是黑帮。陶铸说：‘中央不好表态，李井泉在昆明，由李答复。’李井泉知道后对阎说：‘云南省委在运动前和运动中，打了两个司令部²，我看省委不是黑帮。’李还叫他的秘书把他的意见电话转告陶铸。”

上述情况摘自《凤展红旗》编写的《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引用仅去掉了一些情绪性语言。《云南日报》9月10日和11日发表的社论以及此后接二连三的消息报道足以旁证《风》编大事记录基本真实。云报910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信心满满指出：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认为：关键所在，依然是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地鼓励群众进一步揭发牛鬼蛇神，同时也热忱地欢迎群众对自己工作的缺点提出批评。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才能够沿着十六条的方向乘胜前进，便左派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把多数人团结起来，使右派陷于完全的孤立。

911社论《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话挑得更明朗：

中共云南省委，是领导我省文化大革命的司令部，省委的领导，对于我省的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有着直接的作用。省委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们表示：热忱地欢迎革命的同志揭发批评省委的缺点错误‘炮轰’‘火烧’都可以；省委一定和全省的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省委的缺点错误，一定坚决改正；同时也要求全省的各级党委，都和省委采取同样的态度。

¹ 时任昆明市委书记。

² 指1965年搞掉的“于一川、梁浩反党集团”和文革初期搞掉的“高治国黑帮”。

用官办红卫兵来对付炮轰派，西南局已有经验在先。九月初，四川省委一位负责人在省委召集的各大专院校“联络员”会议上就说了：“学生由于未抓到省委什么大问题，总想借口在成都地区制造匈牙利事件，把罪责强加在我们头上。要组织学生戳穿这一阴谋。”按照李井泉指示，“现在革命干部没有发言权，工农兵说话就是围攻学生。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只有通过他们的子女来说话，因此要组织工农送子参加红卫兵，还要登报宣传”，即宣传“送子参军”（即参加官办的红卫兵），并说：“这与革命战争时农民送子参军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按此旨意，在成都和重庆以及南充、自贡、富顺、新津、彭山等地，官办红卫兵成了镇压造反学生的主力。¹云南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了。

9月12日，由官方操纵“左派学生”组织的全市性保守红卫兵（俗称“三字兵”）迅速开锣成立。9月14日《云南日报》头版通栏套红发布新闻，眉题：“热烈庆祝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正题：“昆明红卫兵隆重举行庆祝宣誓大会”副题：“大会通过宣言。数千名红卫兵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工农兵代表、首都红卫兵代表和省市党政军负责人应邀参加大会并讲了话’”。

所谓应邀参会的党政军负责人，实则幕后捉刀的官员。阎红彦率省、市委领导人周兴、赵建民、刘明辉、孙雨亭、薛韬、吴作民，陈康、鲁瑞林、胡荣贵、张子明、丁荣昌、王银山、刘懋功、崔文斌，赵增益，黎伟、肖持久，戈力、张世桢等出席成立大会并接受红卫兵袖章；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被“聘”为总辅导员；昆明军区副政委王砚泉及政治部副主任许志奋被“聘”为辅导员，徐学惠，赵学全、赵竹仙、王家龙、王宅珍、拓炳荣、姜申等“各条战线上的先进模范人物以及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军代表”一体莅会助阵。大会以鼓掌方式选举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之女、昆明第八中学女生朱勉生为总队长，云南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团支书王鼎三为副总队长。重头戏是闫红彦演讲，他情绪激动，说吸收他参加红卫兵组织，给他戴上红袖章，感到非常光荣。“我愿和红卫兵战士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讲话高姿态称：“我们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还存在很多缺点和错误”

¹ 杨继绳《天地翻覆》第八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欢迎大家揭发省委工作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表态说：“在前一时间，有一些同学提出过‘保卫省委’的口号，我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省委坚决反对这个口号。不可能设想，一个地区的党组织在工作没有缺点错误，尤其云南省委，在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我们要保卫的，只能是党中央、毛主席，只能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最后特别解释：“如果说炮轰是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用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揭发和批判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露党内定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应该的，我们是完全欢迎的。”¹

至于如何“将云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高潮”，此后连篇累牍的消息和表态诠释得明白，云报9月19日社论《英雄的红卫兵万岁》称：

“我们的红卫兵，一定要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在斗争中，要不分学校，不分地区，坚决依靠左派，争取、团结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

接下来的消息《首都部分革命小将与昆明的红卫兵交流斗争经验》更说得直白，叫做“大讲特讲党的阶级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消息说的是云南大学邀请七位“北京红卫兵革命小将”（名唤李青原，玉文波、戴平原、钟德东、王新涛、张涛和张吉平）来校园给大学生传道解惑。中学生皆系京城贵族，消息一开始就介绍了他们的行头：“戴着毛主席戴过的红袖章，穿着父兄穿过的黄军装”七人列队入场，滇人如见天颜，顿时“掌声雷动”，中学仔介绍京城文革“真经”，无非是谭立夫、《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类权贵子弟居高临下、恃强凌弱的暴言粗口。这些段子在京城已不新鲜且已遭到质疑，在云南边地却还能懵人吓人。兹摘录片段如下：

无论是干革命，或者是搞社会主义建设，都要大讲特讲党的阶级路线。要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同样要坚决、彻底地贯彻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依靠谁？依靠我们红卫兵，依靠红五类的子弟，依靠一切武正的革命左派。

文化大革命不依靠红五类，不依靠革命的左派，又依靠谁呢？

¹ 《云南日报》9月14日消息。

他们说我们是自来红，我们感到很光荣，我们就是自来红！

老子英雄儿好汉，革命传统代代传。我们要永远红，代代红，全球红，誓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插通全球……¹

中学京仔对云南大学生的点拨效果不错，“三字兵”接着又以总部名义举行一次数万人大会，继续让小衙内大放厥词。关于这一大型活动，9月18日的《云南日报》再用头版全版加以报道，题目：“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搞好文化大革命”副题：“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邀请首都革命小将向三万五千多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介绍革命的经验”

这回的训诫师名唤钟德东、张涛、张吉平、王文波、王新涛，胡延滨、李青原，裴纯武，李智勇和薛铁华，共10位“小将”，主题依然是“掌握斗争大方向，坚决执行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土里吧唧的云南土佬面前，京油子一个个利嘴滑舌，信口开河，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派”的宗旨，被他们如簧之舌改成了整“黑五类”学生和牛鬼蛇神。在云报消息中，这帮小子不知何来勇气，竟无中生有地发出如下高论：“党中央和毛主席讲得很清楚，文化大革命只能够依靠红五类的子弟，依靠红卫兵，依靠真正的革命左派，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绝大部分的党组织都是好的、比较好的……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揭露一切牛鬼蛇神。”²

与呼风唤雨的北京贵族子弟相比，云南“三字兵”简直就是一帮先天不足的庸辈。“三字兵”总队长朱勉生，乃父朱家璧虽贵为将军，却系云南地下党出身的旁系军官。云南地下党在反右时期“反地方主义”运动，早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女儿咋敢像京城“红二代”那般无法无天？事实上，等到10月初炮轰派学生跟着北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挥棒疯狂起舞，朱副总队长及“三字兵”很快式微消退。几十年后，从互联网上查得，晚年朱女士已成为了享誉中外的中医名家；副总队长王鼎三，出身草根百姓，皆因为学生党员——那年月实属凤毛麟角——这就挑出来勉担大任了。几十年后得知，王同学在彝州楚雄南华县县史办退休，平静终老一生，实无任何惊世骇俗的人生故

¹ 《云南日报》9月12日消息。


² 《云南日报》9月18日消息。

事。9月14日《云南日报》长篇新闻中还提到一个人：边逵，作为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大会慷慨发言者，毕业后恰与笔者有过交集：他在边城保山县革委做宣传，写些学毛著典型材料，笔者其时供职保山专区革委，正好负责学毛著材料的搜集整理，遂有机会与这位当年昆明大红人一道下乡采访。边逵君为人厚道，为文老实，只是经过文革历练，他竟对一些常识性的政治概念都不甚了了，比如撰写瓦窑公社茨竹坪大队书记何某先进材料，他竟写出“毛主席提出接班人五条标准，被林副主席归纳为三条”一类原则性政治病句……可想而知，云南省委当权者们想用这些循规蹈矩的年轻人替他们打垮咄咄逼人的炮轰派，兵力配置实在很不对等。难怪看到“血统论”狂热鼓吹者、北工大学生谭立夫那篇讲话，省长周兴禁不止在9月30日书记处会议，止不住连赞写得很好，道：“谭立夫很有才干，通过运动才能出这种人才。”阎红彦也喟然叹息，道：“北京谭立夫讲话出名了，我们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水平。”1950年代周兴在最高检任副检察长，正好与谭力夫之父谭政文¹同僚，故而感慨尤深。省委秘密指示昆明“三字兵”总部将谭立夫《从对联谈起》的讲话铅印上万份到处散发，还在大中学校大播谭立夫讲话录音。²12天后，即10月12日，谭立夫和搭档刘京一行9人来昆，受到昆明三字兵总部的热情接待。可惜时过景迁，当时北京各大专院校已开始对谭氏谬论大张挞伐，甚至发动造反派缉拿谭立夫。无法京城安身的贵族“理论家”这回来滇完全是远遁避风。周兴将谭等人秘密隐藏位于省委大院附近城乡结合部西坝的昆22中，同时将谭所呈递的一则新文稿《告全国红卫兵、革命师生书》让《云南日报》急印10万份散发——此举暴露了谭的行踪，周兴不得不派专车将9人急送四川泸州再转赴他处逃遁。顺便补充，文革破产后，谭力夫得重掌权柄的父辈荫庇，宦场一路顺风，最后官至故宫博物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他的搭档刘京则于30年后再赴云南，这时他的身份是云南省副省长，“前度刘郎今又来”，自然风光无限。1966年10月那一次云南行匆匆来去，却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红二代”和他们的父辈官僚们的文革岁月，犹如坐了一回过山车，用老百姓话说，所谓革命，其实不过风水轮回罢了，最后鸡还是鸡，凤还是凤。

¹ 谭政文亦时任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

² 林超民博客《扑拙野史》“老子英雄儿好汉”。

就在官办红卫兵成立后第三天，9月14日，在保守势力心脏地区：云南大学，胆大妄为的方向东依仗北京南下造反派支持，高调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炮兵团》。据官方统计，此时先后到达昆明的南下学生已达2145人¹。除了上面提到的少数贵族红卫兵，大多都是些“怀疑一切”“炮轰一切党组织”“斗倒一切当权派”的狂妄不羁之徒。他们在云南推波助澜，大闹天宫。和《炮兵团》同时成立的，还有中文、历史和政治3系为主联合组建的《共产党宣言》公社，物理、化学、数学3系师生为主组建的《井冈山》。三大组织后来成为云大造反派的核心主力。炮兵团成立当日下午，便组织了41所院校1100多人的造反队伍，高举“炮打司令部”、“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炮打阎红彦”的标语上街游行，接着到《云南日报》社抗议，批判九月十日、十一日该报的社论“放毒”“只字不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压制群众运动”“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十六条》”，“就要反”“要对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进行彻底的批判”“要揪出总编辑，打倒‘保皇派’”，要《云南日报》立即停刊。报社工作人员以“遵守中共中央保密通知”为由进行多方周旋劝阻，造反队伍随即又冲进省委大院，要阎红彦接见并处理此事。是时，闫红彦、孙雨亭均躲在昆明军区拒不见面，百般叫阵无果，方向东带领人马驻留省委，于次日上午7时方才撤离。此次封闭《云南日报》事件可与“823风暴”媲美，于是云南文革史上又出现了另一派群众引以为骄傲的名字：“九一四风云”。

补遗：据民间史料载，除了“昆明红卫兵总部”官办的群众组织还有“云南捍卫毛泽东思想总部”和“无产者联合司令部”，但想必战斗力太弱，官方和民间史料都鲜有记录。仅在闫红彦自杀前夕造反派围攻军区，有资料说“三大群众组织召开万人大会，反对造反派进驻昆明军区大院，呼吁维护军队稳定，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会后举行盛大游行。游行中，不断有学生、民众加入。游行队伍特别走到昆明军区门口，向在军区大院的造反派示威，呼吁造反派尽快撤离军区大院。”而后不了了之。² 

¹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实》第41页。

²林超民博客《扑拙野史》“保守派大游行”。

【综述】

地方文革文献资料管窥

——河北、河南官方史志、学术研究与民间著述

启之

河北

一、史志、大事记

官方史书在叙述文革时采取的策略，普遍以谨小慎微和粗简含混为尚。《当代河北简史》（当代中国，1997）《中国共产党河北简史》的表现尤为突出。前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五章）的篇幅，与“抗洪斗争与根治海河”（第四章）“唐山大地震：抗灾与重建”（第六章）相差无几。后者只用了8500字就打发了文革（见第七章“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1966年底石家庄国棉一厂发生的“12·5”事件，¹1968年波及河北十个县、株连全国十几个省市的丘县抓“国民党”的假案，²《简史》只字不提。这两本官史的粗简含混，在市一级的官史中得到了挽救。如《中共石家庄历史》（中共党史，2016）的第二卷就详细地介绍了“12·5”事件。《中共保定地方史》第二卷（中共党史，2009）亦有可读之处。

在官方的出版物中，对河北文革史的研究者最有帮助的文献资料，应该是各级党研室和方志办出的大事记。据笔者所知，河北11个地级市的史志和档案部门，有7个出了本地区的大事记。它们是：《中共石家庄历史大事记（1949.10-1966.4）》（新华，1996）、《石家庄市大事记》（1947-1983）（石家庄档案馆，河北人民，1990）、《中共唐山历史大事记》（中共党史，2001）、

¹ 据《中共河北历史大事记》（1949.7-1978.12）记载，12月5日，石家庄国棉一厂以刘殿臣为首的“要武战斗队”借口厂党委“以生产压革命”挑起事端，纠集“红卫兵石家庄造反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及哈尔滨军工学院来石串联人员，把国棉一厂厦门上砸开，冲进厂内，对阻挡他们的工人拳打脚踢，并将前来解决问题的副市长彭子堪和厂领导同志等三人揪到“红卫兵造反司令部”进行殴打、扣押。据统计，被抓、被打的职工300余人，经济损失：从12月5日至20日共停产34个班，减少产值196万元，少交利润65万元，许多生产工具和办公用品抢走，一些机器设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称12·5事件。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办公室数次给驻军63军来电话，询问“12·5”事件，后派联络员来石调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页409）

² 据《中共河北历史大事记》（1949.7-1978.12）记载，1968年4月，丘县革命委员会少数领导人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一个全县性的、骇人听闻的“国民党”假案。邯郸地革委的核心组负责人把丘县的错误做法当成所谓的经验在全区推广，致使馆陶、曲周、磁县、鸡泽、武安、涉县、肥乡、广平、成安、邯郸市以及地直机关也大抓“国民党”。直至1969年3月才被制止。这一“国民党”假案还想株连到全同十几个省、市，恶果十分严重。

《邯郸地区大事记》(1949-1986)(邯郸地区档案局, 1987)¹、《保定地区大事记》(1949--1985)(保定地区档案馆, 河北人民, 1991)、²《廊坊地区大事记》(1949-1983)(廊坊档案馆, 1984, 网文)、《沧州地区大事记》(1949-1985)(河北人民, 1990)、《中共衡水历史大事记》(1938--1996)(中国文联, 2000)、《衡水市大事记》(1949-1983年)衡水市档案馆, 1984)。更令人庆幸的是, 在上述大事记中, 有5个出自当地的档案馆, 其中有四个的出版时间在九十年代以前, 这意味着, 这些大事记对于研究者来说, 更有价值。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大事记值得参考, 如《刘子厚在河北大事记》(1958--1980)、《石家庄铁道大学六十年大事记》(1950-1979)、《河北农业大学文革大事记》(1966年6月--1987年3月)、《河北衡水中学大事记》(1958-1970), 以及《阜城中学文革记事》(原文出自阜城中学网页, 作者时为阜城中学的学生)等。

二、学术研究

在民间, 研究河北文革的独立学者, 笔者知道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以研究文革中的军队著名的余汝信。他有《河北的“三支两军”》、《文革旋涡中的38军》、《从38军的文化大革命经历看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等学术文章。另一个是要宝钟。要宝钟原名要保忠, 保定人氏, 退伍军人, 文革中曾在保定造反组织中, 担任政委、常委、司令等多种要职。文革后以写作为业。他写的《洪流三部曲》³的第二部《龙争虎斗——河北保定文革史略》一书, 对保定地区的文革有详细的描述, 填补了官史的空白。《中共保定党史大事简介》(河北人民, 1991)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记述省市的扩大会议, 但是对保定的派别斗争, 以及保定的重大事件, 如, 1·21、1·27、2·11等也有专门的记载。

三、回忆、述往

与文革有关的传记、回忆一类的书文出了不少, 河北领导层的如《刘子厚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 2005), 《林铁传记与年谱》(《中共党史》, 2005), 当过华北局第一书记的李雪峰与河北文革关系密切, 但迄今为止, 只出版了

¹ 此书与其它大事记不同, 它的编写和出版都是邯郸档案局, 编者朱金玲是该档案局的工作人员。

² 师誓新浪博客上有转载的《保定文革大事记》, 疑是从这个《保定地区大事记》摘下来的。

³ 此书的第一部是《崩大富》, 第三部是《东皋春雨——宋祖陵发现记》。这两本书在要宝钟的博客中都可以看到, 唯第二部被屏蔽。

《李雪峰回忆录》（上），与河北有关的（下）一直不能问世。在河北文革中起到重要作用的38军领导王猛的传记有两种，一种是由原38军某师参谋长邵宝殿策划，原38军某师宣传干部、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长宋永佳写的《猛将王猛》。此书的第15-21章，记述了38军在保定支左的情况。另一种是原委写的，在香港出版的《猛志常在——王猛将军传》（香港，2008）。

民间的回忆、纪实作品主要有：

1. 赵天佑《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作者是河北鸡泽县赵庄村人氏。时为县小学四年级学生。此文记述了当地的文革：斗老师、破四旧、全县大抓“迎蒋团”、社员们干活磨洋工等。有些细节很有价值。

2. 毛巾工程师《长篇纪实——我的文革》作者时年15岁，在河北某县陈庄的中学读书。此文讲述，他文革初为什么被打成小反革命，想跳井自杀，被救。十六条公布后，他在学校成立造反组织等情事。

3. 王笑笑《我所亲历的河北省政府被夺权的经过》作者时为河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此文讲的是1967年1月23日夜里，河北省地市三级造反联合总部的造反派夺省委党政财文大权的经过。作者还有《我所亲历的两次“土地革命”以及现在的反思》等文。

4. 董保存《河北磁县二·九事件始末》作者是军旅作家。此文写的是1968年早春，河北省邯郸地区磁县县城内发生的“二·九事件”——解放军向正在武斗的造反派开枪，造成51人死亡，伤数百人。作者在《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中央文献，2010）一书中，有的文章也写到了河北文革。如《郑维山“开枪镇压群众”事件内幕》。

5. 刘光生《翻开我的老相册》系列。作者时为唐山四中高二的学生，是唐山文革的亲历者。在此系列中，他有多篇博文谈到了唐山和丰润农村的文革：《文革前夜：我在唐山四中上学的日子》、《1968：母校唐山四中记忆》、《1970：我亲历农村“一打三反”运动》、《我在农村“战备”的岁月》等。文中记述了文革前的“红色教育”，文革中师长和同学受到的迫害，丰润县鲁各庄社员的贫苦，基干民兵的备战，以及民兵连长自造的“信号弹”和“剪鸡毛”事件。

6. 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文革中的中国邱县》（1-4），作者是邯郸的

媒体工作者，此文是他们对邱县文革中抓国民党大案的调查采访，文中详细记述了邱县1968年抓国民党大案的来龙去脉和中央的批示处理。此后，田奇庄在此稿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并将此文收入田的文集《公民话语》。田时为邯郸五中的初二学生。他还有《1966——我经历的文革回忆片断》、《人妖颠倒的1966——我经历的文革回忆片断》、《人兽嬗变——我的一段文革经历》等博文。

7. 刘普伟《文革往事琐忆》(1-6)，作者时为石家庄二中的学生，此文从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写起，至家里被抄，家长被打成黑帮，自己卧轨自杀未遂结束。作者的博客中，还有《石家庄武斗》等谈河北文革的博文。

8. 《风云突变——保定市文革期间武斗情况全记录》(1—3)作者以“直隶保定府”为名，“全记录”者实际上是保定文革大事记，时间从1966年5月1日到1977年5月2日。

河 南

一、史志、大事记

河南省的党研和方志系统，出了不少包括当地文革的史书。省级的史书，如《中共河南历史》(第二卷)(中央党校，2014)和《当代河南简史》(当代中国，1999)，地县一级的党史二卷，如《中共新乡市历史》(河南人民，2012)、《中共登封历史》(河南人民，2012)、《中共信阳县历史》(河南人民，2016)和《中共新野县历史》(河南人民，2013)等，但是，河南文革的五大特点，¹在这些著作中未能得到完整的体现。就学术价值而言，由史志办编写的，九十年代出版的大事记(如信阳、开封、长葛、郾城、光山、滑县、方城、明溪、固始、平顶山、禹州、灵宝县、花县、东港市、东沟县、新县、虞城县、南旺县白银市、沙河市等)的参考价值要比上述史书高一些。

二、学术研究

在民间的河南文革研究中，最著名且贡献最大的是武彩霞。武是原河南

¹ 据武彩霞总结，河南文革有五个特点：一、省委带头，集体支持造反。二、大批造反派进入各级领导班子。三、军队与省委观点相左，支持另一派，视省委主要领导为走资派，由此引发两派争斗。四、造反派以“信阳事件”为切入口，反大跃进，反左倾。揪斗与此有责任的省委领导，受到了镇压。五、进入各级领导班子的造反派，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做出了贡献。详见她写的《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一文。

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大三学生，“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成员，文革中曾任广武公社副书记。¹其主要著述有：《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郑州大学文革概述》、《关于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看法》、《四十周年话文革》、《文革事件钩沉》等文章。这些文章编入《不再沉默——一个文革亲历者的回顾与思考》（中国文化传播，2010）一书之中，网书《霜叶集》（署名一丁）摘选了部分文章的内容。

在上述文章中，《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一文学术价值较高。作者认为，河南文革有五个特点，第一，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十年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第二，河南省的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之中，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做了很大的贡献。第三，以党言川为首的河南的造反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第四，清算文革的“揭批查”是极左的、派性的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五、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

在其他的研究者中，值得注意的还有曾宪坤。其研究的集中于南阳地区，有《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南阳县“文革”“斗批改”时期的“大批判开路”》、《南阳县“文革”初期的内乱与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南阳县“文革”时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等文章问世。

三、回忆、述往

关于河南文革的回忆录，纪实等著作，较重要的有：

1. 关于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汝水清凉《刘建勋其人其事》（此文讲述了刘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文革后的不幸遭遇。可以与刘墨的《刘建勋：“信阳事件”后的“救灾书记”》并读。另外，《刘建勋、陈舜英画传》（展望，2013）和《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2010）中的某些文章对了解河南文革也有

¹ 武彩霞的丈夫叫范念民，是河南农学院农业机械系的大三学生。两人都是农民家庭出身。范念民是河南二七公社的头头，当过省革委会常委。荥阳县委副书记的同时，还兼任广武公社的书记，武彩霞任副书记。（见武彩霞《活在文革“神话”里》凤凰周刊）十余年来，她分别用“霜叶”、“路石”、“一丁”、“鲁石”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有关文革的文章。

参考价值。

2. 关于纪登奎。主要是纪登奎的妻子王纯《忆中南海内旧事》和儿子纪坡民回忆纪登奎的系列文章，如《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纪登奎是怎样成为“造反派”的？》（又名《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

3. 《文敏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97）。文革爆发时作者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曾任代理省委第一书记，1968年被中央定性为河南头号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在河南的代理人”。

4. 方复山《风雨十年路——我所亲历的文化大革命》（作者时任“郑大联委”服务组第一任一号服务员，此文是他写的回忆录，其中有《河南省文化大革命实录》一文。文后有晨明加的按语：党言川已不幸病逝，刘松盛难述详情，方复山不辱使命，黄灯青案，茹苦数年，写成此书。云云。）

5. 周光敏《往事回首——许昌文革纪实》（1-15）（作者是“豫南建筑公司第七工程处”的职工，其母因地主成分被赶回农村。）

6. 刘光耀《回忆开封师范学院“文化大革命”：一个保守派的自述》（1-9）

7. 陈红兵《坎坷十年》（作者时为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六六届大学毕业生，文革时为学校造反组织“八·二四”一号服务员，原名陈荣升。此文发于《今天》杂志第93期“七十年代专辑”）

8. 王焞长《河南纪事》作者时为中央文革记者站的记者，1967年5月被派往郑州了解当地文革情况，此文是他在当地的采访。

9. 郑义《郑大造反派党言川——纪念文化大革命爆发40周年》

四、口述、访谈

1. 李素立采写、整理的袁庚华口述的《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袁是二七公社“火指”负责人，此口述载《记忆》118-119，122三期。）

2. 马秀珍口述、阿陀记录《我曾是在郑州铁路局“二七公社”第二把手》（马是郑州铁路卫校64级学生，1967-68年间曾任“二七公社”第二把手。）

3. 老田主持整理的关于河南文革的系列访谈，包括郑州文革亲历者谢保安、葛丽英等人的访谈；河南兰考文革的杨捍东访谈。📖

【综述】

河北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河北部分》补遗

杜钧福

河北省文革资料比较缺乏。有几部人物传记可参阅。除去两部王猛传记以外，尚有老鬼《胡开明——大饥荒中为民请命的河北省副省长》，大半内容涉及文革时期，着重上层斗争。另有江山《吕玉兰》和杨殿通、崔继敏《杨风鸣传奇》，传主皆为劳模，文革期间曾在保定地区担任领导职务。

关于该省文革的前因后果，可见《炎黄春秋》上的几篇文章。安振英《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和贾志珍《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讲的是文革前夕，钟兆云《江一真在河北平反冤假错案》讲的是文革结束后的事件。

几个地区的有关文献：

石家庄地区：有洪门吹雪博客，博主是河北师大著名造反派“东方红”的领袖。作为主要当事人，该博讲述师大和石家庄文革期间一些重要事件。另有工厂造反派冉工 1941 撰写的《龙飓风》一文，以小说形式写作，人物姓名和地名皆用代号，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仔细阅读，会了解该市文革一些重要事件（如一二五事件）的细节。一位当时中学生张 zh_1003 的博客则发表了他从 1966 年 6 月到年底的日记，讲述该校文革过程。

保定地区：除要宝钟“泰坦尼克”博文重点叙述保定前期文革历史外，有梦舒系保定地区容城县干部，在其博客中着重叙述该地区文革后期历史，如《1976 年：北京学习班实况传真》。

邯郸地区：是河北省文革期间矛盾集中爆发地区，发生过震惊全国的磁县事件和邱县事件。关于磁县事件有广泛传播的董保存《河北磁县二九事件始末》一文，完全站在一方立场讲话，也不符文革后的官方定性。真相可见一些当事人的博客，如老_F《我在磁县那两年》、佚名《一个农村孩子眼中的文革》。至于邱县事件，作家田奇庄等人的一些著作已经较充分反映了这一惨剧真实情况。此外，网上可见的《邯郸大事记》也比较完整、详细地记述

了该地区文革期间重要事件，如对“一打三反”期间几次宣判大会的记载，可用于推算该地区判死刑人数。

在直属邯郸市的峰峰矿区，文革中的武斗和“清理阶级队伍”也很典型，但缺乏完整的记述。可以参看田奇庄《平凡而伟大的中国人尚庆武传记》，以及小说《岁月风云》。

唐秦地区：亦为河北省文革焦点之一，《唐山市志》记述的也比较详细。派别斗争和武斗事件可见杨纪青《文化大革命在唐山》、镜湖客《唐院文革腥风血雨》、吐不出象牙来《730发生在唐山市最大规模的武斗》等博文。文革期间北京来唐山参与地方文革的学生陈左(化名)因此曾被抓捕。他的博客一剑封喉《春天的枯树——我的纪实故事》中一些主要文章已删。陈伯达在唐山讲话制造“三大冤案”事件可见张云杰、闻恩秀、杨福山《陈伯达制造“冀东党”冤案的始末》等文章。

两篇博文：佚名《滦县“文化大革命”的起因、经过和延续》和谭忠惠《文革记忆·风雨山城》分别记述唐山地区滦县和迁西的文革过程，可作为研究县级文革的典型材料。

张宣地区：此地区文革始于宣化，主要原因是当地有几所军校，后扩展到张家口，大致过程可见桃花源客《张家口“文化大革命”纪实》。

沧州地区：有关资料甚少。但此地区文革期间发生著名“伊玛尼党”冤案，可参考沧州党建网《丁溪野及“伊玛尼党”冤案的平反昭雪》以及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有关内容。

邢台地区：有关资料亦很少。《邢台市志》中的大事记可供参考。另见临城县中学生侯风春的长篇回忆录，时间跨度长，包括从农村土改到县城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作者另著有类似题材的“伤痕小说”《荒原泪》。

衡水地区：是河北省最不发达地区，似未成立全地区性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有关材料也比较缺乏。值得提出的是里予的纪实小说《于小乖》记述了景县造反派《五二0》在著名古迹景县塔上坚持七天七夜的事件。

承德地区：缺乏有关资料。胡春宵的中篇小说《佟山武斗记》涉及承德市部分武斗事件。

天津地区（廊坊地区）：缺乏有关资料，《廊坊地区大事记》内容比较贫

乏。雨霏沙龙博文《在廊坊的日日夜夜》叙述该地区驻地从天津搬迁到廊坊（当时叫安次）事。按天津市在文革开始时是省辖市，1967年初改为直辖市。这段时间文革资料包括进天津市部分比较方便。



【综述】

河南文革研究资料小识

——《地方文革研究资料管窥·河南部分》补遗

杜钧福

河南文革研究涉及的一名重要人物是袁庚华。按照“百度”的介绍：“袁庚华，著名民间学者，国史研究专家，对新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诸多热点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曾在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开、俄罗斯科学院等众多国内外著名院校做过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袁庚华先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1946年。7岁随父母迁往河南，在郑州定居。初中后，到郑州肉联加工厂当工人。……1995年起至今，与邵晟东、王宏川共同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在大陆左右派近乎决裂的今日，郑州思想沙龙仍是左右派共享的民间思想平台。”

对袁庚华的访谈和评论甚多。上述“百度”的介绍实际上取自台湾《思想》杂志《袁庚华先生访谈录》。还见陈宜中《永远的造反派——袁庚华先生访谈录》、躬云山《有这样一个毛派朋友》等文章。马立诚《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一书中说袁庚华是“老左派”，不很确切，他不太好归类。例如孙立平肯定了袁庚华的一种说法：“现在是自由派和‘毛派’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袁庚华擅长组织，关于文革具体事件记述不很多，所见有《郑州文革武斗和“文攻武卫”口号》（访谈记录）、《郑州市的“清明节事件”》、《“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在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等篇。

河南文革另一重要人物，也是至今民间舆论的焦点是张钦礼。也引用“百度”的介绍：“河南兰考南彰镇张庄人。1945年参加革命。年轻有为，能说会道。二十二岁就当了解城县县长。1954年兰封考城合为兰考县，他当过县

长。1957年反右派时，因说真话险成右派；1959年，为民请命，打成严重右倾而免职下放到兰考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经平反而重回县委领导岗位。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周总理所救。文革结束后被打成林彪、四人帮余党，至今未被平反。”张钦礼还曾为历史上著名模范干部焦裕禄的助手，因深度涉入文革而受到迫害，去世后受到广大群众的纪念。关于此案及相关事件的介绍文章很多，例如上述“百度”条目引自韩德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而多次访问兰考的新华社记者任彦芳的一些文章可作为另一种意见的代表。比较客观的评述可看尼尔音《兰考张钦礼葬礼的思考》。此外刘占锋著有《张钦礼传》。

文革期间，河南省还发生了一件大灾难，就是1975年8月淮河流域的大洪水。此虽为天灾，但其社会效应不容小觑。这次洪水主要发生在淮河支流洪汝河、沙颍河。8月4-8日，由于台风登陆，在河南西南部山区产生极为罕见的特大暴雨。暴雨集中落在板桥、石漫滩两大型水库上游，引起两水库及两座中型水库，以及58座小型水库垮坝，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对这样大的灾难绝口不提，只见关于河南人民救灾的零星报道，以至于死亡人数至今还在争论。较早报道的是新华社记者张广友《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炎黄春秋》2003年1期）一文。近年来，有关这场水灾真相的文章渐多。至于这次水灾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可见水利专家骆承政、乐嘉祥所撰《中国大洪水》一书中有关部分。

此次洪灾，河南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均遭受惨重损失，以驻马店地区为甚。中央曾拨巨款救灾。但是这些款项多没落到灾民手中。驻马店地区以第一书记苏华为首的地县干部大肆占用救灾款项。他们从当地受灾的1975年起到1977年，共侵占挪用一亿六千多万元，相当于全地区三年财政收入的1.2倍。他们把这些钱的绝大部分搞了楼堂馆所、计划外工程和用于请客送礼、吃喝玩乐、挥霍浪费，成为文革期间典型违纪案件。但此案直至1978年才得到处理，可以参阅当时的《人民日报》。

河南文革有其特点，已有很多文章论述。这个特点就是和“大跃进”的关系。所以研究河南文革应熟悉1957年以来的河南历史，例如“信阳事件”这样的事件。一些研究者如张小哲在《大饥荒与文革》中以亲身体验说明了

这种联系。郑义《大造反派党言川》也主要论述这个问题。党言川是郑州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的领导人，已经去世。关于郑州大学在河南文革中的位置可参看“郑大联委”的另一领导人刘松盛的回忆录《我在1966、1967》。还可见述及河南文革过程的纪实小说《风雨中原》。作者浪花当时也是郑州大学学生。当时郑大附中学生毛新生的回忆录《掠过夜空的流星雨——在郑大附中文革的日子里》讲述该校从文革开始到“复课闹革命”这段历史。

其他一些地区的资料：

开封

除去造反派领袖陈红兵《坎坷十年》外，有当时开封师院附中学生故园脚步的长篇回忆录《文革记忆》述及当时开封市主要事件。


南阳

除去曾宪坤的研究著作外，值得注意的是署名闲情生的长篇回忆录《南阳“文革”亲历记》。作者在文革开始时是南阳一中学生。南阳党史研究室编《南阳地方史简编》中的第六章《“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群众的抵制与抗争》对文革历史也介绍比较详细。李一森《文革时期的南阳教育》论及南阳教育界在文革期间的工作组、红卫兵运动、工宣队、教育革命、马振扶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该地教育的影响。

新乡

马范桥人《记忆里的文革故事》，作者当时是个小学生，但对该市的主要大事件和派别斗争叙述比较清楚。在属于新乡地区的焦作市，焦作党史研究室《焦作大事要览》值得参考。例如记述了文革“破四旧”期间停止供应“五类分子”的粮油供应、没收他们的粮油供应本等事件。

许昌

主要事件可见周光敏《许昌文革纪实》系列。作者当时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对文革过程及百姓生活所述甚详，主要文章发表在其博客。许昌地区叶县在1968年发生“叶县事件”。当时将许昌地委副书记、地监委书记段永健打成“叛徒”、“走资派”，逮捕入狱。此案持续三年多，涉及万人以上。文革后平反。事件可见汝水清凉《叶县424大冤案》等文。

【文 摘】

思想 · 材料 · 文体

——治学杂谈之一

赵 园

“思想”属于我通常避免使用的“大词儿”；在本篇中，大致指的是理论修养、认识能力，包括被称之为“思辨”的那种能力，也指学术活动中更为具体的论题、“观点”之类。所以最终用了“思想”，也取其大，有弹性，能包容。

思想、材料、文体，大致对应于桐城派所谓的义理、考据、词章——只是“大致对应”。为学术研究所需要的能力，其实不出上述三项。桐城派的义理、考据、词章，说的是论学、论文的基本标准，也可以理解为从事学术工作的三项基本能力，造就一个学人的入手处。在古代中国人看来，知识人于义理、考据、词章，不妨偏胜、专擅，但也更欣赏诸种能力兼备、平衡发展，尽管那种人物向来稀有。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偏至”，“偏胜”，此“偏”不是因了其他能力的缺失，而是某种能力特强，是自觉选择与训练的结果，而非不得已的“片面”。

思想对于一个“学术工作者”，理论能力，或者说思考的能力，与文献钩稽、史料整理的能力应当更为基本。对此，传统的说法，义理/考据之外，另有思/学，以至宋学/汉学；与此相关的，尚有“摭实”/“蹈虚”，以及今人所谓的“文献主义”/“超越冲动”等等。即使强调了对义理、考据不应当作对立观，宜力求兼致，而不是偏废，在我看来更为根本的，将学人之间区分开来的，仍然是思维能力，认识能力。桐城派所谓的义理、考据、词章，本来就是一种价值序列，其排列顺序关涉价值估量。即使不囿于“文一道”的传统视野，“义理”作为能力，在我看来也更有基础性。词章总要负载“意义”，即使是较为隐蔽的意义；材料则赖有“烛照”，是对于某一视野、问题、论域的材料。史料的发现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未被作为史料的材料进入了研究。对材料的感受不能不来自作为今人的问题与视野。

顾炎武一再称引宋代刘摯的“士当以器识为先”。¹在他看来，才、学、识三者中，“识”显然具有优先性。古代中国人有所谓的“识度”、“识量”、“识断”、“识鉴”等等。陈寅恪序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称道其“识断之精”（《金明馆丛稿二编》）。“才”多少系于先天禀赋，“学”赖有积累，“识”则需要磨砺。公安三袁中的袁宗道，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以为“识不宏远者，其器必且浮浅。而包罗一世之襟度，固赖有昭晰六合之识见”（《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明代文论选》页307）。这一点，古今所同。当然，“识”不一定取理论形态，认识能力非即理论能力。不理论化未必就无识。但理论训练有助于提高认识能力，是无可怀疑的。每一种严肃的理论思想，都有可能打开一个世界；当然也会有新的遮蔽，但这决不当成为拒绝理论的理由。理论地把握对象，是一种能力；你可以运用或不运用这种能力，但你有必要努力经由训练使自己拥有这种能力。不具有这种能力并不就意味着摆脱了“理论”——你可能使用的是更为简单粗陋的理论框架，而你却不具备对此的判断能力。

所谓的“问题意识”，系于理论视野与“理论能力”。一项研究，往往是由发现了问题开始的。提问不止基于技巧。提问缘于对问题的发现；这种能力是有待训练的。学习提问即学习思考——也包括进入对方的问题，理路，脉络。至于从事一项研究，提出什么问题有时比“解决”该问题更重要。由你讨论的问题，大致可以判断你的研究在何种境界。

需要学习严密地思考——包括思考问题的诸种可能、诸多面向，以及一种特定的思路的限度；还包括思考你所选取的理论框架的阐释力，它的适用范围，它的限度。保持对于所使用的框架的反思态度，也是一种能力。理论工具永远只有有限的有效性。没有“终极”的解释。而诸种理论的融会，“化用”，就我的经验，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

听到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对于“观念”鄙夷不屑，应当是对于近些年理论输入的一种反应。其实区别只在于什么样的“观念”，以及你对自己的观念背景是否自觉，是否拥有对此批评、反省的能力。我们从来是凭借了“观念”的视野看世界、思考问题，也凭借此种视野看取文学的，不能设想不凭

¹ 《宋史》卷三四〇刘摯传引刘氏语：“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顾炎武对刘摯语的引用，如《日知录》卷一九《文人之多》，另如《与友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借任何“观念”的表达、言说。如若你不是与世隔绝，你多半已利用了别人的理论成果，被不断改变着感受世界的方式，即使你使用的仍然是“老词儿”。我想起了1980年代后期对于“新名词轰炸”的责难。我们太容易忘掉历史，即如清末民初、五四时期的类似反应。上述时期大量输入并招致了反弹的“新名词”，大多进入了我们的词库，甚至早已成为常用词。

不以理论为时尚，也就不至于盲目“跟进”、生吞活剥，也不会盲目拒斥。你没有必要拒绝智慧，拒绝新的资源，拒绝自我更新。为了学术发展，需要不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资源，而避免隘陋——“隘”指眼界，“陋”指见识。当然，理论的运用应力求融会贯通，而非仅仅将自己的学术作成流行理论（或只是流行话语、流行语词）的注脚。

章学诚批评他生活的时代，说“近日学者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章学诚遗书》页82，文物出版社，1985）。章氏的批评，对于目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不也有适用性？

更常遇到的，是将与理论有关的能力与“感觉”对立，后者即使不被认为专属女性，也像是以女性更有优长。说某人“感觉很好”，亦褒亦贬，或许意在委婉地提示你其他方面的缺陷，且是限于性别、难以弥补的缺陷。“感觉”作为能力，的确属于不可传授的一种，却不全然来自禀赋；也如其他种能力，可经由（自我）训练而获取。往往正是思想，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了你感觉的方向，解释着你何以对此而非对彼有感觉，以及感觉所达到的深度。也因此，如若你准备从事学术，无论禀赋、个性、性别，都不应当成为拒绝理论训练的借口。思想，即使有十足感性的外衣（如在文学中），或借诸“直觉”的形式，都可以察觉到甚至触摸到它。具体的思想、主张会过时以至报废，而“认识能力”则不会。认识自己生存的世界，思考自身的生存，应当是学人从事学术的基本动力。¹

对问题的敏感是由训练形成的。更为可贵的品质，是穷究不舍、向对象

¹ 思想、学术的对立是人为的，系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环境。我从来不认为有必要在二者之间选择，对“思想能力”的渴慕却是近于一贯的。鲁迅、王夫之因此持久地吸引了我。在阅读中“深度”追求往往压倒了文体偏好——首先选择富于“穿透力”的思想，在这一点上不大像“文学研究者”。在一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深度追求或许会被认为迂阔的吧。而在我看来，放弃这种追求，对于学术是致命的。

持续深入的坚韧——当然先要有深入的愿望，有深入的企图，有穷尽对象的冲动。一个知识论的问题：“你如何知道你知道你所知道的？”很绕，但的确是一个值得经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深究、穷究的精神，或许就在这种追问中养成。在所选择的方向上力图穷尽，使无剩义；又勇于向被认为“题无剩义”之处追索。我在自己的学术经历中，只发现了极少的人具有这种能力，普遍的是浅尝辄止——不止由于懒惰，也因无力，缺乏可资“深入”的凭借。寻根究底，以至“极深研几”，是治学的一种境界。契机往往来自遇到了对你既经形成的判断不利的证据，或具有颠覆性的“观点”。“穷究”是一种代价高昂的艰苦的思维活动、学术劳作；避难就易从来是人情之常。当你确信自己已难以深入，或许倒有了蜕变的可能。作为对策，不妨选择放弃，尝试以重新开始激发创造力，包括选取不同的学术方向、研究领域、工作方式，当然也包括选择学术以外的其他“人类活动”。

强调理论能力、思想能力的重要性，并不因了自己拥有或自以为拥有上述能力。恰恰相反，我缺乏思想的尖锐性，不长于论辩，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即使意识到了问题，也未必能将其“问题化”，组织起有效的反应——不是不想反应，莫测高深地保持缄默，而是无力反应。那常常是一种痛苦的无力感。至于“不在某种既定的理论框架之下”，不全出自主动的选择，而是由于能力的缺失。但上述缺陷并不能使我避开理论的诱导。我显然利用了与他人共享的学术空间、理论氛围。我喜欢用“暗中”这一说法，说自己暗中受到了某些理论的影响，潜移默化，耳濡目染。理论暗示有助于我质疑成见、诸种似乎自明的前提，复杂化对问题、现象的认识，保持警觉，绕过言述中的陷阱。我们不能不浸淫在自己时代的思想氛围中。当然，当代思潮进入你的思路，有可能经了过滤或改装，你的“能动性”在其间发生了作用。真正原创的东西已经稀有。不要轻用“独特”。“独特”之为境界，达到极难，往往被说得轻易了。

但作为对于上文的补充，我还想说到问题的另一面：即使缺陷，也可能有其正面的意义。比如理论地把握对象的能力的缺失，即不大会有“先入”的架构，一些片段、零散的印象、感触，有可能随机组织；思理不够明晰，却也因此留出了缝隙、空当，以备完善、发展；没有过于强势的（别人的）

“问题”引领，未必就有自己的问题，但至少有了挣扎、腾挪的余地；不能进入某种“脉络”，自以为领悟的，很可能是误解——如若你原本就无意于成为通晓某项理论的专家，而你的读解又实实在在丰富了你的思维，误解又何妨？缺乏现成的分析框架，那就由最具体的现象、言论入手。较之设计完备严整的研究，这种工作方式多少有点冒险，比如最终成果难以预期。但作为过程，可能有不期之遇，有意外的惊喜，走到了未曾设想的地方，打开了意料之外的境界……

我仍然坚持“义理”的重要性、优先性，但也注意到，结构严整、纲目清楚、框架俨然的学术作品，有可能轰然倒塌，尤其以某一种理论“架构”的学术作品。缺乏整体性、有机性，被讥为七宝楼台，拆开了不成片段，倘若有着坚实的局部，丰盈饱满的细节，也有可能贡献另一种价值。

涉及一点具体的问题，即选题。

写作《想象与叙述》一书期间碰巧读到 J. P. 迈耶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所写《导言》中引述的托氏的如下文字：“成功机会一半以上就在选题，不仅因为需要找一个公众感兴趣的主体，尤其因为需要发现一个能使我自己也为之振奋并为之献身的主题。”（中译本，页 2，商务印书馆，1992）在我看来，“献身”不必，“为之振奋”则是必要的。较之“公众感兴趣”，毋宁说能使自己“为之振奋”更重要。但我仍然要说，那种令人振奋的开发、发现、发掘的可能性，通常要在你深入该题目之后才会出现。

研究对象的选择之于研究者的重要性，可以孙歌所说的竹内好为例。孙歌在《竹内好的悖论》中说，竹内好是幸运的，“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找到足以契合自己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参照系，也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毕生把一个人物作为自己灵魂的原点。”（《竹内好的悖论》，页 16，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毕生把一个人物作为自己灵魂的原点”，不是谁人都有机会；明智地选择研究方向、研究题目，却是可以做到的。学术工作能创造价值，不全赖于对象，但对象的挑战、激发、诱导，有可能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条件。

选题不只系于技巧，更应当基于自我认知——对自己的强项、弱项。人所成就者不同，所以成就，往往系于是否认识自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缺陷与优长往往并生。人的才禀的差异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大。由能否善用所

长，可以检测学人在学术上是否成熟。更值得珍视的，却又是那种将缺陷转化为优长的意志，为此有必要寻求挑战，选择阻力较大的方向，不畏惧涉足陌生的知识领域。据我的经验，倘若你在研究中遭遇了抵抗，那么抵抗处或许正是关节点，庖丁的刀所遇到的“肯綮”。难度所在，可能正是深度所系。倘若你不放弃，或许会有意外的发现。学人不妨努力在看起来不利的条件制约中发展自己。从事学术工作不必过于功利：以认知为动机，不断补充营养；以难题为策励，激发热情与活力。固然要扬长避短，却更有必要扬长补短，发现自己潜在的可能性。

与寻求挑战同样重要的，却又是限度感。学术工作应当是认清了限度后的奋斗。一个学者的学养与训练，固然体现在做什么，有时却更体现在不做什么，不敢做什么。有所不为，有不敢为，保持对自身限度的清醒意识，自知，知止——这里就有对学术的敬畏。分寸感，限度感，是成熟的学人的标记。看一个学者如何选题，如何为自己划定论述的边界，大致可以知晓其人是否“上路”。

好的选题通常赖于学术经验，久经磨炼的直觉能力，以及由理论训练所培养的问题意识。我一再听到指导研究生的同行要求学位论文的选题有“生长点”，即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倘若那研究生有志于学术，选择能衍生的题目，的确便于滚雪球式地扩展。但日后能否“生长”，未必可以前知。你做的所有学术工作都会参与积累；“生长”的可能性赖有后续的投入，系于个人的能力与机缘。因此不必夸大了选题的重要性。怎样进入题目，选择何种论述角度，是否有自己的线索，自己切入论题的方式、路径，有时较之选择何种题目更重要。值得重视的，是自己最初的感觉，直觉，将第一时间吸引了你的东西抓住，尽管最终的成果可能在全然不同的方向上。不必将选题技巧化，一意求“中”（中选、中标、中试），为此不惜避重就轻，避难就易。近年来学位论文的选题通常以易于“通过”为首要考虑，就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而言，重所谓的“实证”属于对策之一——未必都可以归过于“学术转型”。报刊研究的成为热门，也因边界明确，内容有限，且能“落到实处”，至少可以材料翔实、丰赡取胜。

明智的选择还包括了避免重复劳动。元末明初的陶宗仪记宋元间郝经出

使宋，被扣留在了仪真（今仪征），势不得还，就买书作《续汉史》。待到脱稿，却长叹道，自己“辛苦十余年，莫不被高头巾辈已做了也”（《南村辍耕录》卷二四《汉魏正闰》，页291）。重复劳动，不能不是生命的浪费。

有必要警惕大题的诱惑。下文还要谈到大视野。大视野不意味着做大题目，更不意味着笔下一味嚣张。选题大而无当，有时正由于能力的缺失。没有自己的问题，只能借助于铺张。这里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鼓励“宏观研究”的遗害。大题之外，还有诸种大词儿，动辄“中国”、“20世纪”。对研究者，“大”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诸种“基金”以至出版界都有可能鼓励大题。对抗这种诱惑，或许在严格限定论述范围，将问题具体化——逼你自己向深处开掘，尝试着“挖一口深井”。只有在严格限定了的范围内，研究才有可能深入，同时使“成见”也使理论的适用性、解释的有效性得到检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勇气”中包含了无知，其表现如侈谈“传统文化”、“世界文学”。针对上述倾向，有“小题大做”的说法。“大做”着眼在学术含量。我以为这里的“大”，取决于视野，取决于“相关项”、“相关领域”的发现。相关性是赖有发现的。“相关”与否，系于人的识力，视野，并不现成。越深入，相关的知识领域、论述空间越宽广。不如不用“大”“小”的说法，而取“适度”。

我自己与学术有关的，有过两次较为重大的选择。第一次，考研；当时的首要考虑不是选择一项“事业”，而是选择一个具体的出路。第二次，选择“知识分子”这一研究方向。这一方向上的成绩，就有《艰难的选择》、《地之子》等。进入“明清之际”，也仍然在这一方向上，证明了当初的选择的重要性。你的学术工作中随时会有“邂逅”，有意外的、设计外的、期待外的发现；但有意思的题目，只可能与有准备者“遭遇”，契机也只在确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看似随机的选择，不是机会等在了某处，而是你看似无意地等在了机会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选择题目，我首先考虑的不是该题目的研究价值，而是我自己能做什么，做什么对我构成挑战，同时最大限度地用我的所长。我们通常不得不在诸种限制中寻求发展。因缺陷而另有成就，我想到的例子，就有周信芳，程砚秋。更极端的例子是，盲、聋、哑等官能方面的缺陷，有可能使其他官能高度灵

敏。失之于此，而得之于彼。差堪自慰的是，事后看来，我选择的方向与方式适合于我自己。在最初凭借直觉选择的“点”上持久地开掘，使我有可能是聚集精神以“进入历史”，且在这途程中扩充知识。这正是我所希冀的。

材料

我一向以为衡量人才，尤其重要的，是“能力”这一种标准。如上文已经说到的，你可以运用或不运用某种能力——比如理论能力，比如对文献、史实考据的能力，考察制度沿革、考辨制度异同的能力，依据统计材料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生活水准分析的能力，以至于搜集整理数据的能力，等等——但你不妨试着拥有它。“考据”原非治古代史、也非治古代文学者的专利；但这里我关心的，更是较为一般的文献钩稽、整理的能力。

陈寅恪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审查报告，称许其“取材精审”。“取材精审”应当是文献钩稽、运用中的极高境界。追求在“精审”，即不在量的多少。材料若选择精当，本身就有说服力，甚至不假论说。这种材料决不可能现成地由某种“资料汇编”中获得。征引的“烦碎”，即缘不能精当，材料本身的说服力不足。征引应当是一种发现，对引文的发现。即使对那些被一再引用过的文字，也应当是对其重新发现。这样的征引才不至于成为单纯的炫博。引文在被提取的同时，因嵌入了上下文而呈露出未被发现的意涵，甚至获得了生命力。古代汉语也如外文，有某种不可译性——语义层面外，更有情绪、意境、节调等。通俗化、白话化难免于意义、意蕴的流失。文言的确并非总宜于翻译。凝聚在高度精炼的表达中的力量，有可能在翻译中散失。适度征引，不但有利于保存原文，且有助于丰富我们的语言材料、表达方式。问题是适度。一位同行对我谈到，对材料拣择不能精，往往由于“综合能力”欠缺。所谓“综合能力”，应当包括了知识水平，判断力，文字感觉等等。至于对文献的征引，全引与摘引，各有利弊。摘引的大忌，在牵彼以就我的成见。

取精用宏，是太高的境界，却不妨心向往之。“精”赖有识力。搜集史料，不能过分依赖“高科技”。电脑方便了“关键词”的搜索，不包含此种关键词、却包含有关逻辑的文献材料，不能由电脑发现。电脑也难以发现“相关论域”，发现问题间的相关性。对现代技术手段的依赖，势将更加削弱学人的某些能

力，对材料的感受能力，对文字的感受能力。由电脑搜索的材料也有可能因剥离了上下文而失去了有机性。对材料的“感觉”不能经由训练而得，属于诸多不能由训练而得的能力中的一种。但思想的磨砺，知识的积累，无不在培养这种能力。它得自后天的阅历、经验，似乎与先天的禀赋没多少关系。

我们所关心的从来就不止于是否“事实”，而且是什么样的事实——最终仍然与阐释系统有关。那么就有必要随时审视我们的史料观。陈寅恪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书二编》，页266）史料并不现成。文献的“史料意义”是要靠发现的。新的问题视野有可能将已有的历史题材陌生化，由此而有新材料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敦煌文书的发现，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都属于20世纪重大的学术发现，证明了“新材料”的发现，赖有“新问题”的烛照。¹批评自己时代的学术，黄侃说过，“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蕲春黄氏文存》页218，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发见”应指对新材料的开掘，“发明”则指读出已有文献的新义，所谓发未发之覆。²事实是，无论对新材料的发现，还是“读书得间”的“发明”，都赖有在生活中磨砺而成的感觉与洞察力。

在文献钩稽、史料整理方面，文学研究者不妨向史学学习，重建“范式”。我注意到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对征引及依据的文献，详细注出，可以作为“规范”运用之示例。就该书而言，注释未必较正文次要——你可以知道一个严肃的史家对待他人研究成果的态度，那种广收博采，综合既有研究成果而不轻下判断的谨严作风。我自己涉足“明清之际”，经历了重新学习做学术的过程。“重新学习”包括了材料的甄选，文献的考辨，甚至包括了

¹ 请参看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近代中国新旧史料观点的冲突》一文，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

² 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留学期间·留学所得收获》中谈到，“所谓考证学，在日本时，总认为在文献对证之外，一定要有实物的证据，否则，不能叫考证学。”但他发现在中国，“发掘文献内在的证据，比什么都强。”他认为黄侃是“真的具有能力去实践这种考证学的人”，“不是注重于书以外的资料，而是在书本之内认真用功的人”。他解释黄氏所谓“发见”、“发明”，说罗振玉、王国维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中译本，页79，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

某些技术性的方面，即如规范地征引、注释，也因此有了向学术经典学习的机会，向其他学科的范本学习的机会。

已有的著述形式仍然有利用的价值。不但“资料长编”，年表、年谱，也均为史之一体，作为著述形式并不处于较低的等级，即不止是撰史的准备或副产品。以资料排比“叙述”历史，在排比中发现历史，作为方法并没有失去有效性。即如年谱。我所见的几种近人编撰的年谱，材料尤为丰富，不止呈现了一个时间的序列，而且展开了相当大的面——同一时间中的不同人物、不同场域。上述著述形式已发展得很成熟。孟森《明元清系通纪》，“以明代之纪元，叙清代之世系”（该书《前编弁言》），对于考察明清之际的历史，何等有用！在这方面，文学研究者大可向其他学科学习。我所知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知识结构中通常有皮毛的“西学”，常识的现当代文学，缺乏的往往是古代文学、古典文献的知识与训练。大致相近的知识结构，使所做学术面目相似。倘若其间有了区分，很可能就赖有知识准备、学术背景的那点不同。

近一个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考据倾向，不再止于“模糊影响”、笼统的“印象式”描述，务求修复细节、再现过程。对诸如“制度”一类硬件细密考察、对其间异同进行考辨，是一种值得训练的学术能力。下面要谈到“文本细读”。“文本”包括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后者就有与文学有关的制度之为“文本”。对制度的细读——考镜源流、辨析异同，是前辈学者曾经拥有过的能力。这种考察，所用通常是史学方式。另有其他诸种“实物文本”。细读文本，赖有丰富的理论资源，也赖有细致入微的分析能力，对细节及其涵义的文化敏感。深入对象的肌理、内部结构，从来是罕见的能力。寻常见到的，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与制度有关的考察，无疑会丰富对文学创作所凭借的“文化环境”、“条件”的了解。“考据”原非治史、也非治古代文学者的专利。“考据倾向”也应当出于对空疏（所谓“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反拨。由实而虚，由虚返实，是学术风气转换中常有的选择。无论“蹈虚”还是“摭实”，一旦成为趋向，一定会有偏蔽，引出逆反。考据作为学术方法本有其限度，有适用范围、功能边界。对于文学，作家作品永远是最基本的研究对象，也是最基本的文学史的“事实”。

不止这一个学科经历着人才危机。学术文化破坏的后果，要由几代（甚至不止几代）人承担。有这种意识，才有压力。我对近年来博士论文的印象，就有能力的片面化——除非那是充分发展的“片面”，比如以考据、校雠、纂辑名家。普遍缺失的，尤其是我们惯常称之为“审美”的那种能力。对于文学研究，这种缺失是致命的。一个人片面发展、甚至成了“两脚书橱”，没有什么不好，事实是这种人物已近于绝迹；而一时代的学术，仍然应当追求境界的完整，而非单项达标。基本训练的缺失随处可见。古人说“盈科而后进”（《孟子·离娄》），古人还说“先河后海”；而我们往往起楼而竟没有地基。在这种意义上，说“人才危机”决非危言耸听。

阅读文献、搜集材料，“先入为主”难以避免。我们不可能把脑子腾空了再开始一项研究，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尽可能地摆脱成见，用质疑，用逆向思维，用搜寻另类事实，用其他一切可利用的方式，也包括不囿于自己已达成的结论，自己已形成的研究思路，自己的习惯视野，使结构敞开，随时准备着接纳异议、歧见，修改成见、成说。即使有预设，有预先的想象，在研究中也应力避“目的化”，避免过求“一致”、定向搜集材料，避免意图过分明确，一意论证成见。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几乎任一判断都不难找出例证。因而目标不宜只设在“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上，这不大像是值得追求的境界。无论如何困难，都不妨去尝试探入“历史生活”的肌理，在相互扞格、牴牾的材料中辨认这“肌理”。我已说过对已有的过分目的化了的叙述的怀疑。自己着手叙述，则避免过分明晰、“确定”，力求为不同的想象与叙述留出空隙，以至将对叙述的怀疑作为叙述的一部分。一位老诗人调侃说，想删去我的文字中的那些个“或许”，又说不能删，怕将“评论家的持重”给删掉了。其实我的好用“或许”，并非示人以“持重”，而是为了“存诚”，“修辞立其诚”的诚。“多闻阙疑”也是一种诚。不便仅仅将“或许”、“似乎”作为言述策略。世间的事，尤其其间的因果，不能认定者正多。留出余地、缝隙，使“不确定”得以呈现，是必要的。¹事情往往是，对于对象越深入，就越多疑，越难以作一概之论。至于如何处理“不确定性”与论文文体所要求

¹ 我发现布罗岱尔的那本关于地中海的书并不只告诉你“定论”，还告诉你种种未定、甚至不可能定之论，告诉你他的思路，可供采用的方式及其限度，告诉你无法“实证”因而只能诉诸想象的那一些，告诉你现有的文献及研究手段所不能达到的方面。作者随时在场，力图与你交流，而非隐身在文字之后、学术文体的刻板格式之后，作为一个权威的“我们”，甚至不具身份的叙述者。

的明晰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大难题，我也仍然为此困扰。

还应当说，事实清理、文献考辨与“想象”并非绝不相容。由已知推未知，并不就是无中生有。胡适说“假设”与“求证”，肯定的就有推测的必要性。考据不止赖有工夫，也凭借发现事物、事件、文本间关联的能力，甚至有时比之虚构，更依赖想象、联想。当然，“想象”决非无所依傍。天马行空式的想象与学术无关。至于由无字处读史，由“史所不书”处读史，这种能力不可能仅由书斋获取。

文体

本篇题目中的“思想”不等于“义理”，“材料”非即“考据”，“文体”却包括了“词章”。在我的理解中，作为能力的“词章”，不限于写作美文的技巧，还指较为一般的操纵、驱遣文字的能力；对于学术研究者，则既指对文字的审美能力，又指运用、驾驭学术文体的能力。

上文说到了义理、考据、词章的序列出于价值估量。受制于言说方式，我们不能不排序，但轻/重原是相对而言。也如本篇开头已经提到的，中国传统的学术，鼓励

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作为能力的均衡发展；学术文体则力求典雅。有可以学而能，也有非学而能，后者多少系于禀赋。“非学而能”的，就有文字感觉。上文说到了对材料的感觉不可传授。对材料的感觉往往正系于文字感觉；对于没有此种感觉者不构成“材料”。新材料的发现赖有思维取向、研究旨趣，有时也基于“文字敏感”。衡度一项具体的研究成果，文体或许只有次等的重要性，而对于学者的养成，文字能力却可能有关键意义。在一个文学研究者，文字感觉与文字训练，决定了他能否真正进入文学，以及在文学研究中所能抵达的边界。古代中国人发展出了极其精微的感知文字的能力。令人痛惜的是这种能力的普遍丧失。即使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也在日益“技术化”。撮录所谓的“关键词”，不过是完成论文的一道手续，被技术性地对待；关心只在语义，与语感无关。文字感觉的钝化，不可避免地削弱着对于文学的审美能力，对文学文本的文字层面的分析能力，将分析“细化”的能力。我在其他场合提到了“士文化中的精致品味的流失”，人的自我认知能力的退化，对“人”的感知的钝化；这里应当说，对于文体的细腻的鉴赏、分

辨能力，也如人伦识鉴一样地在流失中。不讲求文体，似乎成了“学者”的特权。读书界对于学术文字的粗率或佶屈聱牙，也视为当然，恬不为怪。

语感，或许是文献在岁月中最先磨损的东西。我相信历史的感性面貌存留了一些在文字间——不止指文字所指涉的，而且指文字本身的组织。如若没有对文字的敏感，文献中的某些层面就不会向你打开。对文字的敏感，不但有可能成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最显然的专业优势，也一定有助于对历史文献的读解，即如有助于你经由惟你才能发现的幽黯通道与古人沟通。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神秘的能力。钱穆所谓“微窥而知”，我猜想也正凭借了这种能力。文学阅读、文学研究有助于培养这种能力。当然，有必要作语言学、修辞学的训练，广收博采，由输入的理论中发现适宜的分析工具，以便穿透文字直达“纸背”，发现文本中的“留白”，窥见叙述的诸种缝隙，察知其间的文字策略，等等。

文本细读，在文学研究者，自应属于基本能力。前几年对细读的提倡，多少针对了“印象式批评”。“印象”难免于笼统。此种批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流行，多少也缘于细致辨析的能力与训练的缺失，以及缺乏相应的理论工具、手段。但“印象式批评”自有其根据和价值。直觉有可能捕捉到某些依现成的“工具”、“手段”不能捕捉到的东西。当然，有浮泛的印象，也有极富洞察力、穿透力的印象。“印象式批评”这一名目，有可能成为对平庸、缺乏分析能力的辩护。分析能力是有赖训练的。以直觉、印象为理由拒绝训练，也就拒绝了更加丰富多样的可能性。确有所谓的“专业读者”；他们与普通读者的不同，在于他们的鉴赏与判断有可能（即使并非必须）诉诸明晰的表述。仅有印象、感觉是不够的。“专业读者”应当具备分析其“印象”、“感觉”的能力。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除了力图“回到现场”，还要有可能被文本本身所打动，被文字间的才华所吸引，即使那才华是星星点点地闪现的，并非烂若云锦。这会使得你对前代作家多一份尊重，不至于一味苛求、“酷评”。在台湾版的《论小说十家》的后记中，我说，写作收入那本书的诸篇时，我曾力图捕捉与传达阅读中的感受，尤其对文字的感受。文字印象本应属于阅读中最基本的印象；而传达那些印象的努力，将朦胧地感觉到的诉诸文字的努力，又

推动了向“作品世界”的深入。我提到过，“某些言论材料的被我选中，也因了富于感染力的表达”（见《想象与叙述》“代后记”）。这里还应当说，某些题目写作的缘起，就因了被文字所吸引。写傅山，就出于对傅氏那种特别的文字组织的兴趣。这里的“特别”非即通常所谓的“美”，更未必是被公认的“美”；你何以被触动，并不总能付诸说明。曾经写过一组散文，题为“阅读经验”，其中说到对于文字的犹如对于肌肤的感觉。你被某种文字吸引，若有宿缘，确也近于神秘体验；在我，也是学术工作中稀有的时刻，正如行旅中对境而怦然心动、骤然感动，却无以名状；感动的发生不需要先兆，事后也无从解释。在这意义上，才能说“邂逅”、“相遇”——的确也是一点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史学研究也需要文字文本的细读。既要“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力求“发见”新材料，又“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吉川幸次郎语，见本篇注4），以图有所“发明”。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一文中也谈到“深刻、缜密地阅读”。“深刻、缜密地阅读”并非谁都能。阅读难免有方向，被暗中诱导。抵抗过于顺畅的理解，及时捕捉陌生信息，并非不需要自觉的努力。事实是，阅读也如做学术，你的全部知识准备都有可能参与其间。我自己就痛感受制于学养，难于进入隐秘的语义层面，不能破解某些含义隐晦的象征、隐喻。某种情况下，即如在“遗民研究”的场合，这种能力显得出奇的重要，而你的知识方面的缺陷也就格外严重。

在文学创作中，用何种方式叙述，至关重要；在学术活动中，用何种方式说，远不如说出的是什么重要。文胜质，或以艰深文浅陋，都属本末倒置。推荐一种自测的方式，即为自己的论文、论著写提要，看能提出什么样的“要”，以至有没有“要”。另一种自测手段与此相仿，即芟夷枝叶，用质直的方式说，看说出的是什么。你的学术贡献多半只是一点，即你的论文赖以立基的那一点。华丽的措辞，不足以为论文增重。说得漂亮远比说得透彻容易，而且易于得彩，却经不住时间，也经不住学术眼光的审视。明晰，准确，是论说文体的基本要求。当然在此基础上，不妨追求洗炼、典雅。“生动”是为了达意，以“不害意”为度。在这方面要慎用“才华”，避免“横溢”。陈老莲再三临摹周昉的画，别人说所临已超过了周，陈说，这正是自己不及周之处。自己

的画易见好，因此“能事未尽”；周则本至能而若无能，也就难能。¹这意思岂不值得玩味？中国古代文论、画论每每说到避熟、滑，其中有得之于经验的智慧。为文亦然，治学也一样，写得太熟，太无阻力，太易见好，就需要警戒。

学术文体有必要也值得训练。对于学术，文体并非“决定性”的，但不可模仿的却又往往是文体。所谓“训练”，不应当止于形式上的模仿，写“似论文”的东西，而是力求经由文体，把握“学术方式”。学院与非学院，这种二分有点简单笼统。学院式的训练自有其意义；学院式论文的功用难以取代，比如难以用随笔札记取代。不同的文体各有功能也各有限度。前不久有机会将旧作《易堂寻踪》与作为附录收入《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的《易堂三题》印在一起，合成了较完整的我关于江右易堂的研究（即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聚合与流散——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该书的随笔部分（《寻踪》）与论文部分（《三题》），分别处理了对象（易堂）的不同面向，或许可以用来注释我有关文体的理解——散文随笔与论文各自的限度，它们进入对象的不同方式，它们间的功能区分、彼此的不可替代。也是在近期出版的散文集《旧日庭院》的后记里，我说，“对自己所写，我更珍惜的，仍然是论文，不止因时间的投入更多，也因在论文提供的空间中，我关心的题目，有可能较为深入地讨论。我对于‘学术斫丧性情’的说法，不那么认同。它不合于我自己的经验。运用何种文体，在我看来，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盛载了什么。散文有可能与‘性灵’无干，甚至示人以卑琐；论文也不妨充溢着生命感，是别一格的‘美文’。”

我以为值得鼓励的是，既尊重学术文体的基本要求，又力求由僵硬的形式、程式中突围，在规范的限定中寻求表达的多种可能——包括自我呈现的可能。尽管学术文体从来不是为了呈现自我而创设的，你却有可能既深入对象又深入了你自己的内心，在无意中铸入自己的心性。

对于一种“学术作品”，决定的不但不是文体，甚至也不是“方式”。在更高境界的学术，使用何种文体——即使文学表达，华彩乐章——都不影响

¹ 毛奇龄《陈老莲别传》记陈氏“尝模周长史画至再三，犹不欲已。人指所模画谓之曰：‘此画已过周，而犹嫌嫌，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画易见好，则能事未尽也；长史本至能而若无能，此难能也。……’”（《西河合集·传》卷七，乾隆二十六年，萧山书留草堂刊本。陈老莲，陈洪绶；周长史，周昉，工仕女）

其价值，无妨其为学术。但对于我们这样普通的学术工作者，学术文体的运用、学术方式的掌握，却决非无关紧要。天才可以不受制于法度，有所谓无法之法，但我辈不行。对于尚未能进入学术者，学术方式以至学术文体，可能是决定性的，即如决定了其人能否入门。“规范”从来专制、压抑；考虑到《想象与叙述》一书预期的读者，我仍然要说，没有规矩即不能成方圆。卡尔维诺在其关于文学的讲稿中，引用了某位作家的一段话，其中说到“在写悲剧时遵守一定规则的古典作家，要比那种把进入脑中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写下来的诗人更自由，后者把自己变成他自己对之一无所知的其他规则的奴隶”（《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译本页123，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也可以移用来说其他种写作。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科研体制之为压抑的谈论。却也不妨承认，体制也方便了“生产”、“制作”——你可以操练得纯熟之极；在这种时候，无宁说是一种令人舒适的压抑。真能感知压抑的，从来是较为自由的心灵。我自己也体验到了“压抑”的“舒适”，尤其在创造力衰退之时。“规范”是双刃剑：既有利于汰除非学术，又便于掩盖平庸。其实我明白，我对“规范”有一种暗中的爱好，尽管由别人看来，我比较不受“学院式”的束缚。我是守纪律的，喜爱整饬、严整，对《世说》中所谓“风格秀整”不免心仪；不大能欣赏名士气（更不消说伪名士），喜爱杜甫的律诗、闻一多的新诗，不大能接受怪异，莫可名状。至于文体的求新变，乃有意的调剂，略微横斜逸出，是规矩准绳内的变异，并没有破坏性、颠覆性，也因此难有大作为，不可能如非常之人的有非常之举。压抑从来不止来自制度；还有诸多我们未必自觉、知觉的束缚。“自由”并不比“中规中矩”容易。脚镣可以为不善舞者提供口实，也可能制造出一种易于操练的舞步。我始终感受着“自由”与“规约”间的紧张。在力图实现自己的构想时，一再遭遇表述方面的难题。也因此一面力求纳入规矩准绳，同时又警戒着被规范“斫丧”生机，时时想“脱缚”，破网而出，喜欢利用一切细小的机会，游走于“正文”之外，“专著”、“论文”之外，尝试别种表述，其他的可能性，为内容寻找形式（文体，结构，笔调）。不被学术过分塑造，对职业、专业的模塑保持一份警戒，努力腾挪，寻找发

展空间，还是需要的。¹

本篇开头提到“偏至”、“偏胜”，这里应当说，宁取此“偏”，也不取“中规中矩”的平庸。“偏”有可能臻于“胜”，“平”则往往无药可医。古人说“俗”病难医，我以为“平”之为病也难医。当然，偏，即难以有大气象，但若善用其才，一定能在先天、后天的制约中，舞出一种精彩。陷落在发展的困境中的学人，大可努力破壳、破茧而出，开发自己的胜境。当然如上文所说，应当是全面训练后的“偏胜”，广泛努力后的收缩。无论义理、考据、词章，固不妨偏胜、偏至，学术训练却有必要全面展开。🔒

此文最初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后收入作者的《想象与叙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一书。作者授权本刊发表。

【读者来信】

1. 俞小平：打在棉花上

我觉得《记忆》249期上王复兴的《从北大文革看“继续革命论”》在继续重复新北大公社派王复兴、宫香政、胡宗式、章铎等人在他们的文章里重复多次的观点，毫无新意。而且章铎和宫香政对我指名发出文章，但是对我的回应文章中所叙说的事实大部分都没有回答，宫香政甚至对我给他列出的在北大武斗中所犯罪行这样严重的指责都没有回应，让我觉得我的论战如同打在棉花上。如此一来，北大两派在《记忆》上的论战确实是在浪费时间，达不到揭示真相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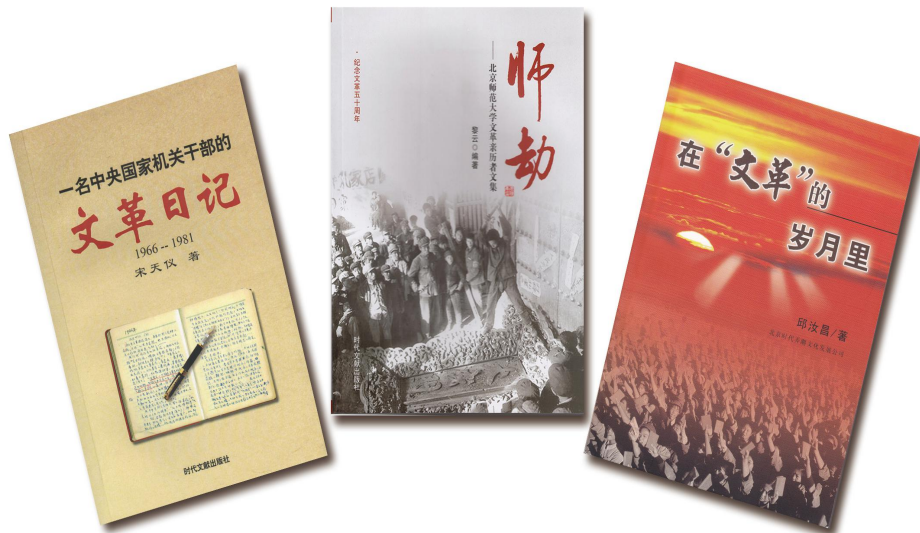
2. 蒋健：250期乌扎拉文章中的衍文

在250期上，有乌扎拉谈“红语”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苏修叛徒集团生疏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显而易见，“生疏”二字是误植。🔒

¹ 友人说，我的学术作品中最好的是《余论》，其次是《附录》。那些以片段为特征的《余论》或《论余》，无非企图由学术文体的僵硬格式中逃逸。容纳其中的并不就是“边角料”，也不一定是有意地“点到即止”，而可能是有待发展的思路，或暂时不能展开但希望有可能伸展的点。非体系的零碎的思想并非没有价值；思想的价值并不取决于表述的形式。



见证历史 传承文化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成立，机构首倡“个人文化、家族文化定制服务”模式；十年来，为全国各地个人与家庭修谱写传六千余种，使“出自传、编家史、修家谱”成为民间文化新时尚。

顺应城镇化时代新移民家庭寻根需求，我们编纂了“百家姓寻根丛书、家用填谱手册”三百余种；编著《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等工具书十余种；设计制作了适用于城市套房特点的“家族文化堂”，引导建设城市移民精神文化家园。2011年春，我们在海淀图书城开办了国内首家“家谱传记书店”，举办“寻根文化讲座”与“修谱写传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民间记忆 文化传承

一、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书店
北京百家姓寻根文化馆
北京家谱传记编辑出版中心

二、定制服务:

(一) 家族寻根:

- 1、寻根报告: 调查家族起源、传承与分布, 撰写“寻根调查报告”。
- 2、传承手本: 祖先渊源、嫡传世系、字辈家训、老照片、大事记等。

(二) 定制出版:

- 1、个人作品: 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 画册、相册、纪录片等;
- 2、家族作品: 百年家史、家谱族谱、纪念画册, 配音相册、微电影等。

(三) 设计家堂:

- 1、家族文化墙: 中堂(祖宗像)、世系图、家训铭、迁徙分布图等。
- 2、家族文化堂: 家族徽标+家族文化墙+家族文化组合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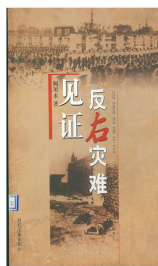
三、讲座培训:

- 1、寻根文化讲座: 祖宗文化、姓氏文化、移民文化、家族文化;
- 2、家谱传记培训: 怎样写自传、怎样编家史、怎样修家谱。

四、加盟合作:

- 1、加盟种类: 地方(社区、县区、地市、省会)家谱传记文化馆、文化养老服务中心;
- 2、经营模式: 家谱传记文化馆+定制服务+兴趣班+寻根游+会员服务。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 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史!



010—6892 0114 8841 5586

服务机构: 北京家谱传记机构——北京传世家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海淀区中关村创业大街(海淀图书城)36号昊海楼一层
查询网址: 《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邮编100080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